

章乃器著

# 出獄前後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出 獄 前 後

章 乃 器 著

★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刊 行

1937

146

# 出 獄 前 後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著作人 章 乃 器

發行人 張 靜 廬

★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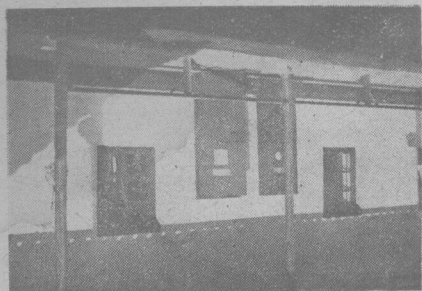
支店：  
廣州漢民北路 梧州大中路  
宜昌二馬路 武昌胡林翼路  
長沙東長街 成都祠堂街  
西安南院門 昆明西華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漢版 發行額四千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粵版 發行額二千册

★ 加價式成  
每册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 ★

甲 項：第三七號  
出版物：第一六一〇號

# 出獄以前



↑ 六間  
平屋，牢  
獄中的天  
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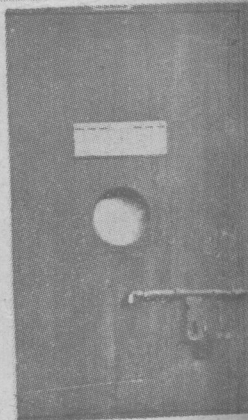
自己洗衣  
服，比老  
媽子洗得  
好。↓



牢門的鎖在門外  
面。許多人把自  
己鎖閉起來，鎖  
是在門內的。↓



門禁森嚴，裏  
面却依然是人  
的社會呀。←



# 出 獄 以 後



## 自 勉

沒有信念，情願不做，  
定了信念，生死以之。

我對統一戰線有信念，

我願爲統一戰線效死。

不驕張，不退縮，

不崛強，不屈服；

緊緊的把握現實，

沉沉着着的去做；

向着真理的光芒，

進一步就是一部。

# 出獄前後

## 目錄

反不凡主義·····	一
大學程度時局觀·····	六
救國會和救國運動的前途·····	九
中國的前途·····	二三
論憲政運動·····	三三
我與青年·····	三九
由前方主義轉到後方組織·····	四七
怎樣展開弄堂組織？·····	五一

抗戰以後·····	五五
少號召多建議·····	五九
回鄉運動·····	六三
合理的統制·····	六六
論戰時金融·····	七〇
現階段的救亡工作·····	七六
反求諸己·····	八三
再論戰時金融·····	八六
今年的棉花問題·····	九三
今年的雙十節·····	九九
負擔起來新時代的艱苦任務·····	一〇一
平凡的領導和平凡的組織·····	一〇六

抗戰時期的民主問題·····	一一一
現階段的救亡運動·····	一一八
以抗戰到底的決心去運用九國公約會議·····	一三〇



# 反不凡主義

(獄中雜著之一，以社文筆名發表)

現在有些「自命不凡」的人物，在交際場中，在平常談話時候，在團體集會裏，總要發表一些「不同凡響」的議論或主張，以表示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英雄俊傑。可是，天下的事情畢竟都是平凡的，一切的真理都離不了平凡的現實。當然，有些人是真能發爲獨到的見解的。但是這種獨到的見解，也正要從平凡的方向裏得來，而決不能從不凡的方向去鑽牛角尖的。頭朝着天的不凡人物，是不可能看見社會裏形形色色的平凡事情的，自然更談不到從那裏面找取真理了。所以，合於真理的獨到的見解，和「不凡思想」是剛剛南轅北轍的。那就是說：自命不凡的人物，雖然天天想發表不凡的獨到的見解，而結果呢，決計吐不出來合於真理的獨到的見解，至多只能說一些凌空的不切實際的「高調」來眩惑幼稚膚淺的人們罷了。

這種自命不凡的人物，在提出他的獨到見解的時候，往往演變而成爲一定的公式。比方，假使大家在討論一件事情，而估計出來一個必然性的時候，他便舉出一兩件偶然的事情，以「萬一」的口氣來提出他的獨到見解，以圖推翻那個大家同意的必然性的結論，有時候大家的討論把握住某一件事情在這一階段裏的絕對性，他便要提出過去以至未來階段中的某些相反的因素，以推翻大家一致的這一件事情現階段的絕對性。有時候大家根據具體的事實來討論一件事情時，他使用很空洞的口氣，如「事情不是這樣容易的！」「天下事情變化多得很呢！」「將來的事情將來再看吧！」……類似的句子，以打斷大家的討論，而爭取他的「獨到主義」的勝利。有時候上面所說的種種手段多沒有運用成功，而他的不凡依然表示不出，他還可以用一種極莊重的態度和極嚴肅的語調，像變戲法的人在揭幕以前向觀衆做作的樣兒，提出一件不重要的事情，而想最後單在態度和語調當中表現他的不凡。要之，這種人的目的，只在表現自己的不凡，而事情會不會弄糟，却不在乎。

這種不凡觀念是很危險的，因為它可以欺騙許多膚淺幼稚的人們；特別在羣衆當中，不凡的人物會提出極左的口號，而沒有訓練的羣衆，往往會被他的極左口號所欺騙的。甚至在一個會議當中，也往往可能因為不凡人物的存在，使大家一時爲遷就起見，而暫時同意於一個不十分切合真理的折衷案。許多人明明知道真理並不如此，也並不肯放棄真理，但爲了「面子」起見，便不惜稍稍的犧牲了一些真理。

可是，這種折衷態度往往也要發生危險的；因爲，把一個合於真理的主張和一個背於真理的不凡高調折衷起來，那個結論往往可能是半真理、半高調，那結果依然是侮蔑了真理。所以，我們應該在任何場合公然提出「反不凡主義」，以肅清這種個人主義的有害思想。

本來，「不凡」、「獨到」……都是很好的，這就是一般所謂天才者和富於創造性者所稟有的特質，而天才者和富於創造性者是在不論那一個時代，那一種社會裏都迫切需要而應該受人尊敬的。但是「不凡主義」、「不凡觀念」、「不凡思想」、「獨到主

義」「獨到觀念」「獨到思想」……都是要不得的原因。就因為不凡主義者，是不顧社會、民族和團體的利害，而只求一己的不凡。這正和英雄是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需要，而英雄主義却絕對要不得一樣。

我們在傳記當中看到關於托羅斯基生平的鱗爪，就可以看到他是一個不凡主義者。但是，這種人是到處可以找得到的。許多「反×××主義」「反××論」……一類的書籍，就是這一種人的貢獻。這種書在懂的人看來，真是要笑痛了肚皮。就在他們自己，也往往明知自己的作品很膚淺；但是，一想到非此不足以表示不凡，也就只好硬着頭皮出版去了。在一個會場當中，用一些叫囂的語調博取聽衆的采聲的，也往往是這種人——當然，並不是能够博取聽衆的采聲的都是這種人。

這種人，你倘使說他是個人主義、英雄主義、或者聖賢主義者嗎？他是不服的。你說他們是衝鋒主義者嗎？他有時是可能由極左一變而為極右的——只要當時極右能表現他的獨到和不凡。只有說他是「不凡主義者」，或者他容易自覺一些。這說明了不凡主

義這一個名辭的鑄造，並不是爲要表現「不凡」。

最後我想到了目下文藝界中的所謂「反差不多運動」是不是含有「不凡主義」的意味呢？「差不多」而取消了創造性，而成爲公式化，那是不好的；然而，倘使「反差不多」而變成「不凡主義」而在「不凡主義」的方向公式化，那自然是更不好，而且極其危險！

(二六·三·一三——立報)

## 大學程度時局觀

(獄中雜著之二，以杜文筆名發表。)

在本月六日的大公報社評裏，我們發見了一個新名詞，叫做「初中程度的時局觀」。所謂「初中程度時局觀」，原文雖然不會舉出例子來，然而顯然是指對敵人主張強硬的一切論調。

有了「初中程度時局觀」，自然不可沒有「大學程度時局觀」。那除了大公報的主筆先生可以當之無愧以外，像胡適之一流人物，自然也是很配資格的。

這些自命爲「大學程度時局觀」的人物，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呢？

那幾乎是異曲同工：大約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主張不抵抗的少不了他們；在「一二八」戰爭以後，主張訂立淞滬協定的也少不了他們；在長城戰爭以後，主張簽訂塘沽協定的也少不了他們。特別是他們隊伍裏的胡適之先生，他曾經做文章大捧塘沽

協定，認爲後此中日兩國可以相安無事——放棄東北四省原是胡先生一向主張的。

胡先生當時還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痛罵岳飛是軍閥，而高讚秦檜是一個有眼光、有手腕的政治家，想爲「今之秦檜」張目。後來還有另一位「大學程度時局觀」的朋友，就把胡先生的高見，編入一本什麼白話中國史裏去，由某大書館代爲出版。不幸得很，這部書畢竟是被查禁了！

這許多事實，已經足夠告訴我們「大學程度時局觀」是怎樣的高明！就是胡先生，在前年華北分離運動發作，他的「終身教授」地位幾乎不保的時候，也曾經很感慨的發表談話，說自己過去的「時局觀」是錯誤了。胡先生錯誤事小，中華民族却已經吃了大虧！這就是所謂「大學程度時局觀」的貢獻！

這也是一點都不足爲奇的，因爲自命爲「大學程度時局觀」的人們所足以自豪的，只是多了一些「內幕的消息」。但是，很可惜的，他們少了一個完美的理論工具，不能把這些「消息」做一個有系統的觀察，所以結果是看清一株一株的樹木，而看不見樹林；自

然更談不到把這些「消息」做一個見筋見骨的解剖，所以雖然稱爲「內幕」，而實際却不過是大汗滿頭的在皮外面數一根一根的毛，回頭給我們一個毫無用處的報告！

這到也並不是說他們不聰明；或者還是地位所關，不能不「利令智昏」吧？爲了要保  
持一個崇高的社會地位，爲了要保持偌大的財產，求一個苟安自然是他們頂聰明的打  
算。但是，到了敵人不容許他們苟安的時候，可就變成「聰明自誤」了。這本來也是可以意  
想得到的；然而這種「意思」畢竟是太使他們掃興了，到還是情願不去「意思」，而姑且  
在享樂的夢中多過一些時候。

所謂「大學程度時局觀」就是這麼一回事！



## 救國會和救國運動的前途

(獄中雜著之三，以金鋒筆名發表)

在最近的幾個月中間，大家對於救國運動的前途，有了種種不同的估計。過分樂觀的人們，認為在三中全會之後，政治趨勢已經起了一個突變，救國運動以後自然可以一帆風順，毫不費力的達到最後的目的。過分悲觀的，却認為一切都不過是玩手法，掉槍花，政局依然還是過去的政局；政權的本質不變，一切的希望都是幻想。尤其在法院對七先生提起公訴以後，這種悲觀論格外的抬頭，有許多人對聯合戰線都一時失去了信仰。

其實呢，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都是機械論的。聯合戰線的鬥爭，是和通常的革命鬥爭一樣艱苦的；在情緒的抑制上面，聯合戰線的鬥爭，甚至比通常的革命鬥爭還要艱苦。我們難道不看見別人爲了聯合戰線的勝利，還要大流血嗎？只有幻想的人，只有投機取巧的人，才會希望有一帆風順的前途。但是，這種人是根本不配做任何的政治鬥爭的，

因爲任何的政治鬥爭都是艱苦的，都是要抱定極大的犧牲決心的。真能做政治鬥爭的人，只問我們有沒有光明的前途，只問目下的路線能不能達到這個光明的前途，而決不希望一條沒有荆棘的路線。一個航海家希望不遇風浪，那就根本不能成爲航海家。所以，我必須指出：救國運動的前途，決計不能一帆風順，而且必然是風波迭起；聯合戰線的路線，也決計不是平坦無阻，而必然是荆棘叢生，乘風破浪，斬除荆棘，便是我們的事情，而且，是我們的當然任務。我們既然以身許國，難道還應該躲懶，還應該希望逃避嗎？

悲觀論往往就是從樂觀轉形的。有些人過去把聯合戰線看得太容易了，所以一遇到波折，馬上就變成悲觀論者。這有什麼奇怪呢！一個一心想走坦途的人，一遇到荆棘，自然便要彷徨，有的甚至還要退却！倘使是一個一開始就準備做斬除荆棘的艱苦工作的人，到那時便會毫不遲疑的拿起大刀闊斧來幹，絕對談不到什麼悲觀。我敢說：悲觀的人不但對聯合戰線信仰不夠，而且對一般的政治鬥爭的修養也不夠。

這種樂觀論和悲觀論的存在，究竟會不會阻礙聯合戰線的前途？自然，對於聯合戰

線是有相當的不利的，所以我們必須儘量的說服他們。然而也不必怕，因為樂觀論者是不久就會受到事實的教訓的；他們的一帆風順的幻想，是馬上就會被粉碎的。悲觀論者如果真是想救國的人，他們在再三思索之後，結果一定會想到：我們在目下只有一條路——只有聯合戰線這一條路。他們還會想到：聯合戰線決計不是幻想，幻想的只是一帆風順的樂觀論者。

本來樂觀也並不是壞的事情；但是機械的樂觀論却真要不得。做政治估計是有一定的合理方式的，那就是：對於自己的前途是樂觀的，對於鬥爭的過程是不能一味樂觀的。換句話說：樂觀當中是有不能樂觀的因素的。所以我們對於上面所說的「樂觀論」似乎是稱它為「機械的樂觀論」較為適當。

救國運動和聯合戰線的前途究竟能不能樂觀呢？澈底的說來，我們相信弱小民族必然可以求得解放，我們相信中國必然不會滅亡，而且相信中國必須在抗日戰爭中爭取到民族解放，我們就無論如何也不能否定救國運動是一個歷史的神聖功業，它的前

途是再光明不過的。同時，這也是很明白的，聯合戰綫的對面便是不斷的內戰，但是中國全國的人民，已經不容許任何人再進行內戰；那末，不管說救國也好，說建國也好，除了聯合戰綫還有第二條路嗎？再從過去一年餘的鬥爭結果來說，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一二九」以前的景象是怎樣，目下的情形又是怎樣。別的不說，連日本駐華大使川越也公然承認抗日是中國統一的因素了，連親日派的首領也公然說抗日了。這是「一二九」以前所能想像得到的嗎？此外，內戰畢竟是停止了。不管還有些人厭惡聯合戰綫這一個名辭，但是，憑他們提出「和平統一」也好，「統一救國」也好，「團結禦侮」也好，內容究竟能逃得出聯合戰綫的範疇嗎？打開天窗說亮話，目下反對聯合戰綫的人，爲來爲去也不過爲了一個領導權。他們心裏在說：「不要你們的聯合戰綫，要用我們的聯合戰綫。」但是在我們呢，我們站在聯合戰綫的觀點，倒儘可以不管是誰家的聯合戰綫，只要有一個真正的聯合戰綫的成功，就是我們的勝利。這猶如不管誰抗日，只要是真抗日，我們都應該贊成一樣。聯合戰綫自然也要有領袖人物，而且也要有一個中心的領導力量。（目下有

些誤解聯合戰線的人，認爲聯合戰線是一幅平分天下的太極圖，或者是一個互爭雄長，各不相下的一盤散沙，那是完全外行話。於是，在這中間，爭領袖地位和爭中心領導權的黨派，是不能不分一分彼此了。然而，在救國會，我們既然不爭領袖地位，也不爭領導權，只要有個聯合戰線的成功，就已經是我們的勝利。只有我們存了一種成見，或者把黨派的立場放在第一位，把聯合戰線的立場放在第二位，我們才會對於領袖和領導權問題存了一種分別歧視的觀念。

就說三中全會以後的情形，上層方面的表現，自然有很多使我們失望的；但是在下層群衆方面，無疑的，救國運動和聯合戰線都已經有了極大的開展。歌詠運動的遍滿全國，上自政府官吏，下至兵士工農，都滿布了救亡的歌聲，這難道不是救國運動的新開展嗎？這難道不是聯合戰線的很高度的運用嗎？

我不能不指出，悲觀的人們往往是只看見救國會，不看見救亡運動的。他們始終不會逃得出關門主義的圈子；他們關起救國會的大門來做救亡運動，只見門裏面的人數

減少，就以爲是失敗了，就悲觀了。倘使他們打開救國會的大門往外面看一看，便會知道馬路上已經到處是往日牆門內的情景，便會看到過去在牆門內的人，正在馬路上領導更廣大的群眾，發揮更大的力量。我現在就希望救國會的同志們大家都到門外去看看，而且學一些在外面做救亡運動的方法，因爲，躲在門裏做和跑到馬路上去做，做法自然是不同的。

說得詳細一些：我們應該永遠的站在救國運動的立場，而不能過於偏狹的只拘泥於救國會的立場。在救國會的立場不妨礙救國運動的限度之內，我們可以保持救國會的立場去擴大救國運動的影響；但是如果超過了這個限度，救國會的立場足以妨礙救國運動的時候，我們便只好毅然決然的放棄救國會的立場以保全救國運動。那就是說：救國會的立場和救國運動的立場能够同時兼顧，自然是最好勿有；但是，到了不可得而兼的時候，我們便只好放棄救國會的立場，而把握住救國運動的立場。

如果這個原則可以確立，那末，我們就應該進一步檢討一下：目下是不是兩種立場

能够同時兼顧的時候？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說「是」和「否」都是過於機械的，都是萬萬不夠的。所以，我一面不能同意於把救國會機構馬上完全放棄，而一面也不能够同意於照舊的到處拿出來救國會的「招牌」。我認爲救國會的作用，可以分爲三個部門來講：第一是政治領導的作用，第二是組織本身的作用，第三是公開號召的作用。說到政治領導的作用，救國會在過去一年半中間，的確已經取得極大的影響，在推進團結禦侮的任務上，的確已經建立起來不可泯滅的功績。因爲這種信仰已經深入於人心，已經替聯合戰線安置下去很鞏固的基礎，我們是不能把它隨便放棄掉的。否則，救國會損失事小，使許多羣衆突然失去了領導，以至徬徨無主，那才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那才是救國運動的重大損失。所以，我認爲我們在目前自然應該設法逐步把這種政治領導的任務，移轉到公開團體和公開刊物的身上去，逐步的放鬆自己的仔肩，但是萬不能突然放棄。

再說第二種組織本身的作用，那個情形可說和第一種作用大同小異。我們已經訓練出來這許多幹部，已經組織起來這許多羣衆——不客氣的說：民衆當中頂覺悟和頂

勇敢的分子，大多數都已經組織在救國會裏面。這不能不說是救國運動中的一個偉大的力量。倘使一旦就讓他們渙散了，對於救國運動自然是一個極大的損失，對於幹部和羣衆也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已經在過團體生活努力從事於救國運動的人們，一旦讓他們失去了團體的關係，放棄了救國的工作，那個徬徨的痛苦，的確是很難忍受的。本來，救國會的會員當中，有許多是另有其他的公開的團體關係的；這一部分人，多數也已經能夠把救國工作搬到他們所屬的公開團體裏去，作更廣大的開展。這種人可說是不成問題的，只要在政治領導上能和他們取得一個聯系就行了。所成爲問題的，便是許多沒有其他的團體關係的人們。我們除了應該普遍的原則的指示他們加入公開的團體裏去活動，或者組織新的公開團體之外，甚至還應該通過我們的幹部，作個別的指示。我們不但要指示他們去開始活動，而且還不斷要檢查他們的活動方式是否正確。總要設法使大家都不至於徬徨，不至於向隅，不至於走錯了路，而且能夠保證救國運動的影響因此可以擴大好幾倍，我們的任務才算完成。



說到第三種公開號召的作用，那是應該毅然決然停止了。事實上，目下拿出救國會的名義，絕對不可能號召一個公開的行動；勉強的作冒險的嘗試，只有加深救國會和當局的矛盾，只有無謂的犧牲了勇敢的幹部，是絕對的得不償失的。本來，公開號召的目的，並不是要出風頭，也並不是要滿足會員的行動慾，更不是很無謂的表示救國會的存在，而是要吸收更廣大的羣衆。但是，在目下，救國會的名義只能嚇跑了羣衆，而不可能吸收羣衆；在行動當中和當局起了不幸的衝突，或者受了不幸的逮捕，恐怕要連原有的羣衆都退却了。就是通過了個人的關係，以救國會會員資格替救國會徵求會員，或者爲救國會公開宣傳，都是勞而無功的。恐怕一提出「我是救國會會員」自己先就有點不自然；所以，恐怕不但要嚇退了羣衆，而且也要嚇退了自己。倒還不如以一個單純的愛國者的資格，站在救國運動的立場，自己反可以覺得理直氣壯的，反可以大模大樣的做，而且可以取得極大的成功。

要明白，現在的開門主義，也和從前不同了。過去的開門主義，是要我們打開救國會

的大門，自己坐在櫃台裏面做零賣生意；爲了要生意多，門面上少不得還要裝一副年紅燈的招牌。現在可就不同了，我們是要打開了救國會的大門，自己出去做跑街，到許多零賣店裏去做批發生意；年紅燈的招牌，是根本不需要了。自然，做批發生意的方法和做零賣生意不同了；我們要注重大戶頭，一筆生意就是五箱十箱；一丈二丈、一疋二疋的賣買，我們是不必做了。自然，只要懂得做批發的門檻，生意可以比零賣時候大幾倍或者幾十倍，而工作反而輕鬆得多。還有一點：做批發的時候，市面的好壞是不能照上門的賣買來估計了；是要看馬路上一般店舖的情形來決定了。那就是說：我們估計救國運動的影響，是要把眼光放大了一個圈子，而不能只就救國會活動的範圍來斷定了。

現在，許多夥計們已經自動的去做跑街，而且已經做了很好的賣買了，爲甚麼不更澈底一些，放棄零賣生意，而專心一志去做批發生意呢？當然，在做批發生意的時候，原有的營業所依然是要的，而且有許多不會學會做批發生意的夥計，是要設法訓練他們的。同時，也許有些跑街做賣買過於遷就一些，只要能賺錢，我們依然要鼓勵他們去做。相當

的加以糾正，不讓他們妨礙整個的營業方針，那是可以的，但是不可隨意懷疑他們，動不動就指為奸細。

最後，談到七先生被捕的問題。我們看一看七先生被捕以後那種和平容忍的態度，就可以明白：我們應該努力營救七先生，應該在營救運動中擴大我們的影響，應該把營救工作和救國運動聯系起來，然而營救的方式決計不能超過聯合戰線的態度；尤其不能因為七先生的被捕和提起公訴而懷疑聯合戰線，甚至主張放棄聯合戰線而和當局對立起來。既然聯合戰線是我們的終極目的，我們便沒有理由因為在鬥爭中間受了打擊，就主張放棄這個目的。我們只要認定聯合戰線的鬥爭是很艱苦的，我們並不是希望毫不費力而取得成功的投機政客，我們更沒有理由經了一些打擊就馬上懷疑聯合戰線的前途。七生為提倡聯合戰線而被捕，他們早已經聲明，願為聯合戰線盡瘁，我們難道應該違反他們的意旨，因為他們的被捕就懷疑聯合戰線，使他們痛心嗎？剛剛相反的，我們應該更加努力地聯合戰線的完成，才能使他們得着莫大的安慰。七先生在獄中，會對

人說：「想到無被辜捕，不能不有一些忿怒，但是一想到東北同胞在敵人鐵蹄下的慘況，不覺心平氣和了。」這種只計國仇不計私怨的沉痛、誠摯的言論，就是聯合戰線的一個標準；我們對國內除了漢奸以外，對於任何人都應該這樣寬大容忍的。要時時想到：聯合戰線的對面既然只有不斷的內戰，不斷內戰的結果自然只有全國的淪亡，那時候夢想聯合戰線也再不可得了！我再要指出：我們沒有更好的路，我們只有聯合戰線這一條路！

我們還得明白：營救七先生的運動，早已經是一個聯合戰線運動。且看，除了救國會之外，黨國要人、工商鉅子、名流學者，以至許多和救國會沒有關係的大眾，都在為七先生奔走呼籲，救國陣線真是廣泛極了。這一面表示七先生平時促成聯合戰線的主張和赤誠，已經博取了廣大的同情——聯合戰線在影響上已經建立起來，不可磨滅的勝利，而另一面却可以表示出來聯合戰線的作用，是如何的平凡而偉大。我們只要明白這種事實，便知道我們必須要在擴大聯合戰線的影響當中，要從更廣大的羣衆口中提出「釋放七先生」的口號，才能達到營救運動的勝利。簡單的說：我們要從聯合戰線的勝利當

中取得營救運動的勝利。

總之，從歷史的任務來看，從過去的一年餘間的收穫來看，救國運動和聯合戰線前途的光明，都已經毫無疑義。當做推進救國運動的一個工具看的救國會，是應該以救國運動的前途為前途的；只要救國運動發展，我們便沒有對救國會悲觀的理由；倘使救國運動這一個名義可以號召，我們便不需要拿出救國會的名義來號召。我們所要完成的，是救國運動的金字塔，而救國會不過是石匠的鐵鎚。過分珍惜石匠的鐵鎚，金字塔是不會成功的；不善用石匠的鐵鎚，金字塔也是不會成功的；爲了要適合金字塔的各部門的工作，我們還應該有大大小小、輕輕重重、各色各樣的鐵鎚，而不能拘泥於某一個形式的鐵鎚。自然，我們也只能拿金字塔來號召，來誇耀，而不能拿鐵鎚來號召，來誇耀。倘使因爲某一種鐵鎚應用起來特別的靈便，我們可以廣爲介紹，然而決不是拿它來號召。

工作的艱苦，主要的就指寬大、容忍。想到聯合戰綫不能滿意，便應該想到比不斷的內戰總好萬倍；想到對當局失望，便應該想到比東北、冀東的情形好萬倍；想到某些同志

不够堅定，不够努力，便應該想到比漢奸賣國賊好萬倍。聯合戰線有待於我們的奮鬥，當局有待於我們的督促，同志有待於我們的規勸，那是沒有問題的；然而決不是絕望的，而且是不必悲觀的。當然，我們也決不能樂觀到認為聯合戰綫不必奮鬥，當局不必督促，同志不必規勸的地步。這種機械的樂觀和悲觀，結果都是消極，都是取消了救國運動和聯合戰綫。我們要在極大的寬大容忍當中，盡我們最大的努力，然後能夠完成聯合戰綫的功業，然後能夠取得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

## 中國的前途

(獄中雜著之四，以聶奇筆名發表。)

中國的前途究竟怎樣呢？在過去，大家因為思想的岐異，有了種種不同的意向。憧憬着明治維新的人，幻想中國可以步日本的後塵；到過新大陸的人，幻想中國可以步美國的後塵；由遠東病夫聯想到近東病夫的人，希望中國能做土耳其；由國民革命聯想到十月革命的人，希望中國能做蘇聯；崇拜慕索里尼、希特勒的人，還幻想中國可以變成意德。時代變化得太快了！陳舊的幻想，已經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碎！國難又太迫切了，過於急激的希望，又感覺到欲速則不達！中國能够步日美的後塵嗎？十九世紀的舊套，是可能在二十世紀重演的。中國能够變成意德嗎？半殖民地一盤散沙的經濟組織，絕對不具備法西斯蒂的物質條件；在法西斯蒂瘋狂侵略下的國家，也絕對不應該替法西斯蒂推波助瀾；以三民主義建國的中國，更不容許有法西斯蒂政權。中國能够變成蘇聯嗎？依

照中山先生的遺教，將來是可以殊途同歸的，然而現階段的革命路線，却是兩樣的；我們丟開理論問題不談，目下的環境也顯然不容許我們那樣大刀闊斧的幹。因此，留下來的典型，便只有土耳其的前途。但是，土耳其畢竟是土耳其，它在發動民族革命的時候，正當戰爭的低潮，那時歐洲列強方在筋疲力竭，喘息未定；決不像我們現在正當着一個新戰爭的高潮而必須反抗一個養精蓄銳的日本帝國主義。土耳其的國土，也不像我們這樣廣大，國內的政治情形，更不似我們這樣複雜。由前之說，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要準備比土耳其還艱苦幾十百倍，而決計不能夢想可以一戰而決。由後之說，我們還得注意到我們內部統一的鞏固，實在需要一個更寬大、更民主的方式，而決不能像土耳其那樣的單純。

中國的前途怎樣的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是在西安事變以後，特別的顯現出來。在以前，許多有一些政治思想而沒有政治關係的人，也許已經感到同樣的苦悶；但是有政治信念或政治關係的人，各人都在爲自己所信念的前途而努力，倒



並不感到苦悶。在目下感到苦悶的倒特別是後一種人：他們所信念的前途，現在起了動搖了，至少在最近的將來是只好暫時攔起了。我相信，這一階段裏思想的苦悶，主要的內容便在這裏。

不錯，「抗日第一」的一個口號，是可以解決一些苦悶的，然而絕對不夠的。我們應該在那一種政治路線之下抗日呢？抗日以後中國將變成怎樣一個國家呢？每一個有較深的政治素養的人，不能不提出這種更進一層的問題。何況在目前，正式的抗戰還不曾發動，實際的抗戰工作還不能療治思想上的苦悶，而且誰都知道，政治路線並且是保證抗戰的澈底和最後勝利的一個武器呢？

因此，我們需要對於將來的國家畫一個輪廓；我們必須平心靜氣的屏棄一切過去的成見，在應付這空前迫切的國難的大前提之下，根據當前的客觀條件，訂立下這一個輪廓。只要這個輪廓訂立得很適當，大家都願在這個輪廓裏面加緊的努力，苦悶自然可以解除，國家的前途，也可以格外光明。

我們在畫這個輪廓之前，要注意到下面的四點：

- 一、我們的路綫是半殖民地爭取民族解放的路綫；
- 二、我們不但要有一個獨立的國家，而且要有一個進步的國家；
- 三、我們正當着空前的國難，處在一個不能爭取解放便要滅亡的關頭；
- 四、國內的政治派別，本來很紛歧，日下因爲大家都要救亡，所以能够互忍互讓以求統一。

在這四個條件之下，我要大膽的說：中國的前途，應該是土耳其和墨西哥的混合品，這就是我所提議的輪廓。更詳細點說：關於抗敵救亡和統一完成，我們希望能有土耳其的成績，而準備更艱苦些；關於民主政治，我們必須採用墨西哥的標本，也準備更艱苦些。中國非抗敵無以救亡，非抗敵無以統一，然而非統一又不能保證抗敵的勝利。這一點是和大戰以後的土耳其相同的。中國政治情形的複雜和領土的廣大，非有比較土耳其更寬大的精神和更民主化的制度，便不容易鞏固統一。這一點是和墨西哥相同的。自然，這

不過是一個輪廓罷了，詳細的內容是不可能這樣簡單的。

也許有人認為對於這個問題——中國的前途怎樣的問題——的解答，只須很簡單的提出「建設三民主義國家」的口號。自然，這是不錯的，然而在說明上是不足的。爲要使說明易於了解，實質的輪廓本來遠勝於抽象的口號。爲要使說明有更大的確定性，實質的輪廓也是需要的。爲甚麼少數信奉三民主義的人會傾向德意法西斯蒂輪廓呢？這就因爲缺少了一個正確的實質輪廓做標準，所以走了錯路。先訂立下來一個輪廓，再用三民主義做大家的行動綱領，這正是三民主義可以正確開展的一個手段。這裏所謂「行動綱領」是針對着「思想傾向」而言的。那就是說：我們一面奉三民主義爲行動綱領，一面仍然保留思想的自由。要用三民主義來齊一大家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行動步驟，那是對的；想用三民主義來限制大家的思想自由，却恰好變成違反三民主義的階段——民權主義正是保護人民的思想自由的事實上，在推進三民主義的時候，我們正需要其他的哲學思想做一個有力的工具。

在這個輪廓之下，讓我們再來研究我們的領袖問題。蔣介石先生的民族領袖地位，現在是連多年對敵的共產黨都加以承認了。共產黨一面表示願意以全力共同完成三民主義，一面又承認了蔣先生的領袖地位；十年糾紛，一旦解決；民族陣線，在和平中奠定了基礎，這真是民族之萬幸。所以，現在說到領袖問題，它的前提也已經確定了；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不過是在這個前提之下的一些內容罷了。我們所希望於蔣先生的是能夠融合土耳其民族領袖凱末爾和墨西哥現任總統喀地那的地位和本質，而成爲比他們更偉大的一個歷史人物。詳細點說：我們希望他能有凱末爾的權力，而同時有喀地那的寬容。

爲要迅速應付當前的國難，我以爲人民應該給蔣先生以比較通常民主國家政治領袖更大一些的權力，使他可以隨時動員全國應敵；那個權力的範圍，或者要和凱末爾在土耳其的權力差不多。但是，又因爲中國領土的廣大和政治情形的複雜，都遠過土耳其；人民久苦內爭，都切望國內和平統一基礎的鞏固；因此，我們認爲蔣先生必須有喀地

那的寬大精神，使國內各黨派都有參政的機會，勵行民主以鞏固統一。本來，三民主義的內容，就比較土耳其國民黨的黨綱來得寬大，所以，這一點也是很自然的。西安事變以後，蔣先生寬大的胸襟，已爲中外所共見；幾月來蔣先生和褊狹份子的鬥爭，的確也是很艱苦的。但是，全國人民在渴望和平統一之餘，大家都希望有一個寬大仁厚的領袖；所以，蔣先生愈表示寬大，人民愈願意把權力集中在蔣先生，蔣先生愈表示不願獨裁，人民愈希望他能動員全國的權力。這是從近來的輿論裏面可以看得出的。本來，人民所以不願政府權力過大，爲的是怕政治領袖胸襟褊狹，濫權專制；對於一個不至於濫權專制的領袖，人民到是願意給他更大的權力的。所以，更大的權力和寬大的精神，是相成的而並不是相悖的。

現在把上述的三層意思總括一下：對於民族解放的前途，我們希望在抗敵救亡和完成統一方面，能有土耳其的成功；其在民主政治方面，希望能採取墨西哥的標本；對於政治理論，我們希望大家能够一致以三民主義爲行動綱領，而保持思想的自由；對於領

袖，我們希望他有凱末爾的權力，而具喀地那的寬大精神。

這樣的一個輪廓，我相信是很中庸、很合理的。共產黨都已經取消蘇維埃政府了，左傾的方面自然不應該再希望中國一脚就跨進蘇聯的階段；主張完全民主制度的人，也應該明白中國已經在戰時狀態之下，不能再幻想過去法美的典型，而需要給政府以迅速動員全國的權力；想把中國變成法西斯蒂意德的人，應該明白在歷史上，這是一條不應該走的路，在客觀條件上，這是一條不可能走的路，而由促進統一和尊崇領袖的意義來說，目下已經建立起來一個自然的基礎，更不必有這種反常背理的號召。

只要大家能够一致在這個輪廓裏面努力，中國必然可以救亡圖存，必然可以爭取民族解放，而且必然可以成爲一個進步的國家。只要中國能够建設一個進步的國家，我們就可告無罪於歷史；只要中國能够積極的反抗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消極的不走上意德法西斯蒂路線，我們就可告無罪於世界。

最後我還須提出的，就是上文所說的準備更艱苦一些，不但是說我們應該準備更

大的犧牲，而且是說我們應該準備更大的容忍。一九三四年執政的喀地那，誰都認定他是一個墨西哥的理想領袖人物，誰也知道他有前進的意識。然而，他處境的艱難和克服反動勢力的艱苦，是特別值得我們借鑒的。他到現在還不敢和蘇聯締結國交，而且不能不容留托洛斯基居住，以爲自己前進政策的掩護。他一心要保護工農的利益，然而竟被迫不能絕對制止他管轄下的軍警壓迫工農。在這種環境之下，他自身的忍耐，固然可以注意；而民衆對於他的信賴，絕不因此而少衰，那種忍耐的程度，尤其值得我們效法。一個領袖的心跡，假使已經表示於大衆，他的行動也已經一步一步向光明的前途邁進——

即使是緩慢一些，他又始終很堅定站在民衆的立場，民衆是應該用極大的容忍，和他一致奮鬥，以達于成功的。我指出這種情形，當然不是說我們應該滿意於這種情形，而是說爭取解放的責任，仍舊落在大衆自己的肩膀上。大衆自己還沒有充分的力量和反動勢力對抗，單單責備領袖人物是沒有用的。到不如一面加緊培養自己的力量，一面給領袖人物以適當的諒解和忍耐。自己增加了一分力量的時候，當然應該要求領袖進一步，然

而千萬不要自己只有一分力量，就希望領袖做到三分。期望領袖過高和責備領袖過嚴的人，也正是把領袖當做天神看的人，是和盲目崇拜領袖的人一樣錯誤的。

(二六·八·五——新學識)



## 論憲政運動

(獄中雜著之五原擬以聶奇筆名發表)

「原來人民權利不能保障，全看人民本身有沒有實力。空空把人民權利列舉在憲法之上，是沒有用處的。法國現行憲法沒有規定人民權利，然而人民權利並不受政府蹂躪；吾國自臨時憲法以來，每次憲法及憲法草案均有長篇條文規定人民權利，但是人民權利到底在那裏？」

這是薩孟武先生在憲法草案中之「人民之權利義務」一文中的幾句話。這種意思，在過去許多先哲都已經說過，在將來也是永遠不朽的。

近來，有些朋友要求我發表一些關於憲法的意見，我心裏就起了一個矛盾：我一面很迫切的希望憲政時期的到來，而一面又沒有興趣去談憲法問題。

我爲甚麼沒有興趣去談憲法問題呢？因爲我目下所切迫需要的，是救國的自由和

參加救國工作的機會平等；我目下所極端厭惡的，是青年無辜的被別人陷害，是社會上某種勢力可以非法的逮捕人、拷打人，甚至殺害人。爲了國家的生存，爲了個人的安全，我只想能够在事實上取得這種起碼的自由平等，同時能够在事實上消滅這種非法的黑暗勢力，我還沒有那麼大的奢望要求一百四十八條的憲法草案能够全盤實施，自然我更沒有興趣把這部洋洋大觀的憲法草案咬文嚼字的逐句逐字推敲起來。

如果約法已經不是一道萬靈萬應的神符，憲法當然也不會是一道萬靈萬應的神符。倘使在訓政時期我們不能依賴八十九條的約法取得一個起碼的自由平等，難道我們還應該夢想在憲政時期可以依賴一百四十八條的憲法取得更大的自由平等嗎？約法是堂堂皇皇印在每一部六法全書的卷首，它從二十年六月一日公布到現在，已經超過了六個年頭。我們翻開來一條一條仔細的看，可說大半不曾實行；不但未曾實行，實行的方向大半剛好是背道而馳！我們在約法頒布以後，自由平等的權利被剝奪的，只有比從前格外厲害！一般人不必說，甚至律師替別人辦案，就很少能够引用約法精神來解釋

法律條文，更談不到替當事人爭取約法的權利！

比方，約法第八條規定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現在有做到沒有？秘密的逮捕、扣留，根據的是那一條法律？同條規定逮捕以後，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現在有做到沒有？被非法拘留超過二十四小時的，簡直是極平常的事，甚至幾個月、幾年而不加合法審判的，也所在多有！再比方，約法第十三條，規定人民有通信秘密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然而，目下郵電檢查，遍滿全國，它所根據的又是那一條法律？再比方，約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結社、集會之自由，第十五條規定人民有發表演論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均不得停止或限制之。試問目下的限制，是否根據合法的法律？法律的精神又是否符合約法？上以不停止、不限制為原則的精神？再比方，約法第二十條規定人民有請願之權，為甚麼目下又不斷的有因為請願而被驅逐或拘捕的事情？

十八年六月十七日三屆二中全會還通過治權行使之規律案，原文的一段：「（二）人民之生命、財產與身體之自由，皆受法律保障……其經合法程序而剝奪之者，司法院

及其所屬，有提出質詢之責。其非法剝奪者，以越權論，司法院及其所屬不提出質詢者，以廢職論。這中間包含着多麼嚴厲的保障人權的意義，然而會有什麼效果？越權的還不是到處在越權，而廢職的還不是到處在廢職？何以會毫無效果？何以會依然越權？何以會依然廢職？我們歸根結底不能不怨人民自己沒有力量。

對於眼前身受的重重壓迫，不敢提半個「不」字，對於火燒眉毛的救國自由和平等權利不敢提半字要求，而要高談闊論研究憲法上廣泛的民主權利，自然要便大家感覺這是紙上談兵！對於已經頒布的約法，尚且不能運用，而先希望憲法頒布以後天上會掉下來人民的權利，自然要使大家覺得這是舍近求遠，望梅止渴！老實說：憲法即使不好，總會像個樣的；無論如何都不會規定人民可以隨意逮捕，隨意壓迫，隨意殺害的。目下的主要問題，就問人民有沒有力量使憲法能够徹底實行。倘使沒有這個力量，憑你有怎樣好的憲法，也是枉然！

因此，我們必須下這樣的一個結論：憲政運動是一件事，而憲法研究又是一件事；憲

政運動可以包括憲法研究，而憲法研究不能包括憲政運動。憲政運動是大眾的事，是一個群眾運動，是要用群眾的力量做基礎的；而憲法研究却是少數學者的事，是附屬於憲政運動的，是群眾力量的基礎上面的一個上層建築。在憲政運動當中，我們首先要提出和每一個人有切身利害關係的頂頂迫切的要求，而不應該提出空泛的、高深的理論和條文，然後才能够喚起大眾的注意，然後才能够使大眾踴躍參加。在現階段的中國，我們必須提出起碼的而最迫切的救國自由和參加救國工作機會平等的要求，而同時要堅決的反對人人切齒痛恨的非法逮捕、非法拘禁和一切非法的壓迫。我們先根據約法爭取這種起碼的權利和保障；我們要認定約法權利的爭取是踏進憲政時期的一塊階石。我們還要防止少數人拿出憲政運動的招牌，做自己爭奪代表的工具；要明白，這是少數人的參政運動，而不是多數人的憲政運動。總之，少數人研究憲法，少數人要求參政，那都是可以的，而且他們天然都有這種權利，但是決不能用憲法研究和參政運動來代表憲政運動。憲政運動必然要是大眾的，必然要以群眾力量做基礎的。倘使沒有群眾的力量

做基礎，頒布了一個十全十美的憲法固然沒有用，選派了幾名或者幾十名的代表又有什麼用呢？

本文係章先生爲新學識而寫，旋因滬戰發爆後，已排就而未付印，故本文並未發表——編者識

# 我與青年

(獄中雜著之六，出獄後始發表)

## ——自傳之一章——

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然而是一個不堪回首的地方！

在「四五」運動發生的前後，我正在北通州的一個京兆農工銀行裏面服務。那時候，北京政府正在親日派份子的把持之下；他們的活躍，彷彿和前些時冀察政務委員會裏的情形差不多。不過在離北平四十里的北通州——一個沒落的中古時代的都市，當時倒依然過着很寧靜的生活。而現在呢，它却是很不幸的變成殷汝耕偽府的所在地了！

寧靜是表面的，我相信每一個有血氣的青年，看到了當時報載列強對中國橫蠻無理態度和北京政府的顛預、黑暗以及種種喪權辱國的情形，尤其是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以壓迫國內革命勢力的情形，恐怕沒有一個人不悲憤填胸，熱血沸騰起來幾乎要炸

破了血管。但是，可憐，他們還沒有能够組織起來，把熱血沸騰的蒸汽打成了一片風雲，把微弱的呼聲結成了大地的怒吼。因此雖然屋子裏零零落落的關着不少在那裏爲國事歎息、流淚的青年，而表面上還是一個寧靜。

這中間便存在着一個我；在十個數字和十三檔算盤的生活中間，不斷的自己對自己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國家亡了，難道還要覷顏過奴隸的生活嗎？」

同事中間也不乏熱血的人；有些人起初不注意，後來和他們詳細說明了，他們也認爲奴隸的生活是過不了的。

但是，怎樣做呢？我們却都存這一種陳舊的錯誤心理：國家大事總得做了大人物才能管得了，赤手空拳的我們是徒然的。從眼前做起，從身邊做起，把自己幾個人先組織起來，再去匯合那偉大的時代潮流：這些，我們那時都是不知道的。

霹靂一聲，歷史的「五四」運動展開了！興奮得幾乎使我發狂！不管報上說北平的空氣如何嚴重，我不能不請了假，到那裏去看一個明白。



在前門車站下了車，步出車站，車站前面就排列着一隊不知從那裏來的學生，手裏拿着寫標語的旗子，臉上表現出來嚴肅而悲痛的神氣。

我看了，莫明其妙的一陣心酸，平素不容易流的眼淚忽然情不自禁的流下來了！這一隊爲了要挽救民族危亡而怕犧牲自己的純潔青年，使我起了無限的愛慕，留給我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

「誰欺侮純潔的青年，誰壓迫純潔的青年，誰便是我的敵人！」這句話從此永遠鑄在我的心坎裏！

但是，我當時總還是用一種神秘的眼光看着他們，認爲他們是一羣配管國家大事的「天之驕子」。也許，那時候的學生也是用神秘的眼光看着自己的，並不會覺得應該號召一切的人們都來管國家大事。我徘徊在他們隊伍的左近差不多有幾十分鐘；我不敢近前去，他們也沒有理會我。大家都有一顆救國的赤心，但是中間却隔着一條無形的鴻溝！前面是一條偉大的時代的巨流，但是我竟想不出來一種方法參加到這個巨流裏

去！倘使那時候有人向我「援手」一下，我想我是對他感激不盡的。一個救國有心而赴難無路的人，是如何的苦悶呀！

在北京城裏盤旋了大半天，始終找不出來一條通時代巨流的路。於是，我就只好在「望洋興歎」之後，搭着車廢然而返了！

X  
X  
X  
X  
X

在以後的十幾年中間，青年又不知遭受了多少次的屠殺，國難又不知嚴重了幾千百倍！想到了國難，總想起了青年。有時候雖然也狠狠的責備他們：「有血氣的青年難道都死盡了嗎？爲甚麼還不起來呢？」內心却在感着慚愧：「有經驗的中年人爲甚麼不起來呢？」而每一次聽到純潔的青年受欺侮、受壓迫、受屠殺，就馬上聯想到前門車站前面的一隊，就感到無限的悲痛。對着這樣純潔可愛的頭腦鞭笞，甚至對着那純潔可愛的一顆心放槍的人，我總認爲他是沒有人性的。

有一次，有一位沒落的政客在一個聚會裏趾高氣揚的說：「青年，青年有什麼用呢？」

三架機關槍就可以對付他們」我聽了很生氣，就責問他：「恐怕你心目中的青年，不過是別人的兒女吧？倘使你是三架機關槍中的一個槍手，你在描準的時候，忽然發見前面的青年隊伍中站着你的兒子，你這一架機關槍恐怕就馬上失去效力了吧？只要大家能够想到這一班青年都和自己的孩子一樣是血肉做的，一樣的受家人父母的愛惜，而且和自己的孩子一樣的天真純潔，恐怕每一個有心肝的人都耍手軟了吧？」

這位政客想到他自己的兒子了，也就默然了。

X X X X X X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太示威，使我的心靈受到無限的刺激。我們的青年戰士，爲要參加救亡運動的巨流，有的冒了大險爬城牆，以圖衝破城門的封鎖；有的成群結隊的跳出校牆，以衝破學校當局的壓迫。他們用血和肉抵抗軍警的長槍大刀，用心靈裏發出的熱力抵抗天上來的風雪和水龍裏噴出來的冷水。中華民族決不會滅亡；不滅亡的基礎，就靠千千萬萬寧死不願做亡國奴的青年。中華民族是偉大的，這偉大就表現

在千千萬萬爲公理、爲正義而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青年。

在「一二九」之前，華北是密布着不堪回想的陰霾——不，簡直全國都滿布着不堪回想的陰霾。吸白麵的無賴要冒充民衆請願「自治」，而且居然能得當局的接待；反對僞自治的青年隊伍，反要被拒絕接見，而且勒令解散！河北省政府的衛兵，被日軍繳械，而且剝了軍服之後，再受掌頰唾面，以至在他的身上便溺的，非人侮辱，還只准他笑，不准他怒！此外，市民、青年、學者被日軍警隨意殺戮、逮捕的，更是層出不窮！這還成一個什麼世界，是人所能忍受的嗎？

但是，傳播在報紙上的，依然是一片親善妥協聲！流行在上層社會的，依然是一片歌舞昇平聲！人類！這是有血氣的人類的勾當嗎？民族！這還能算是民族嗎？我的血管快要爆裂了！我走出門怕看見嚴重的注視着我們的太陽的光輝！

畢竟，我們的青年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出現了！他們奮不顧身的義勇，使我感激零涕；而他們悲壯的鬥爭史，却又使我哀痛，慚愧！我幾次的一面看報紙，一面痛哭

失聲！我責備社會上有地位的中年人，爲甚麼不起來站到青年的前面去。只要他們站在前面，既然可以指導青年，同時又可以保護青年；既然可以使青年少耗費許多不必耗費的勞力，同時還可以使青年少流許多不必流的熱血。因爲我自己也是中年人，而且是有地位的中年人，我當然還要自己責備自己！

有一天，一個女學校請我去演講，我看見前面有這許多純潔的青年伸長着頸子等待我的指示，聯想到許多華北的青年正在被別人欺侮，不覺悲從中來，情不自禁的大哭了一場；在場的青年也都鬨堂的哭起來了！過了些時，我才咬緊了牙關，告訴她們：「哭是沒有用的，我們現在不必流我們的淚，而應該要流我們的血！你們有一個自然的集團，你們應該先起來；但是你們要努力團結學校以外許多想救國而找不着一條路來參加這時代巨流的人們！我告訴你們十六年以前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吧……」

這時候，上海文化界已經發表了救國運動宣言，不但我們許多中年人已經準備站到青年的前面去，連幾位老年人也下了同樣的決心了。

我們要創造一個更值得紀念的日子——中華民族解放紀念日，我們要收復一切  
不堪回首的地方！

(二六·一〇·一六——宇宙風)

## 由前方主義轉向到後方組織

在民衆情緒過分消沉的時候，我們應該把房子裏面的人動員到馬路上去，以喚起民衆的愛國情緒。在民衆情緒過分興奮的時候，我們却應該把馬路上面的人動員到房子裏去，以運用他們的愛國熱情。這是我對於民衆運動的一個總的原則。

根據這個原則，我們現在應該怎樣辦呢？

我這番回上海的一天，正是戰爭開始的一天。幾天來我所感覺到的，民衆是興奮極了，是興奮到浮動的狀態了。馬路上站着的和來往的，有搶着買號外的人，有追着聽消息的人，有見到自己的飛機而拍手喝采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上海一隅的民衆，是用不着再做喚起的工作了。

許多青年來見我的，幾乎是異口同聲的提出一個迫切的要求：怎樣指點他們一條

路去做前方工作。青年的熱情更是不必鼓勵了。

我經過一番的攷察，我認爲目下民衆方面的缺點，是炮聲已經喚起了廣大的群衆，然而絲毫沒有組織，因此表現出來浮動的狀態；青年已經下了堅定的決心，然而缺乏理智的領導，因此表現出來感情的衝動。簡單的說，是一般民衆缺乏組織，青年缺乏正確的領導。

因爲青年太熱情於前方的犧牲，我就鑄造了一個「前方主義」的新名辭。自然這種熱情是可以寶貴的，但是就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兩個問題：

- (一) 前方工作有沒有巨大需要以及設備上能不能容納？
- (二) 青年有沒有比前方工作更切要、更有價值的工作？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在眼前是否定的。事實是這樣：作戰的人員，目下還補充不到已經受訓的壯丁，其他更不必說；慰勞的代表只能限於少數人，而且也不能上前線；救護方面，受過訓練的人據說一時已經用不了，車輛的設備也沒法輸送更多的人到前方去服



務。因此，急於衝向前方的人，便要感到苦悶，而且，這種苦悶是一時無法解除的。

關於第二問題的答案，我認爲是肯定的。我從前曾經說過：所謂戰時國民總動員，決不能大家都揹着槍上戰場；倘使全國一萬萬名的壯丁，只知道揹着槍上戰場，戰爭是沒法支持的。因此，我曾經批評：千篇一律的公民訓練和壯丁訓練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再進一步，根據每人的職業和生活，加以特殊的動員訓練。依同樣的理由，我認爲目下的職業青年，應該在本身職業上先盡更重要的任務，到不得已的時候再衝到前線去。我認爲目下在金融、糧食、五金、電料、藥品、燃料等業的職工，倘使能有嚴密的組織，消極的使敵人不能利用我們一絲一毫的物資，積極的使我們自己能保持適當的供給，那就可以大大的增強抗敵的力量，那個價值也許比到前線去衝鋒還要大。其次，各種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更絕對不能到前線去衝鋒。一個修理飛機的技師，倘使能修理好一架飛機，就比到前線去拋一千個手榴彈的功勞都要大。知識分子，倘使能把自己所在的弄堂裏的住戶組織起來，施以戰時常識的訓練，告訴他們以正確的戰事消息，指點他們對於生活資料的

處置，將來還可以動員他們做供應前方的工作，那個效力，也比自己一個人到前線去衝鋒大幾十百倍。

因此，我主張現階段的民衆運動，應該趕快克服前方主義，穩定浮動人心，而以職業組織和弄堂組織爲經常中心工作。我們要在這經常中心工作中，補充自己一些前方工作的訓練，準備在不得已的時候再衝到前方去。鬥爭的時期是很長久的，鬥爭的過程是很艱苦的，拼命的機會正多着哩！在目下，大家還得把情緒穩定下去，把艱苦的組織民衆和訓練民衆的工作負擔起來，用最高的理智運用自己的愛國熱情！只有這樣，民衆的力量才能表現出來，也只有這樣，青年的苦悶才可以解除。這是我所懇切希冀於知識分子和青年的。

## 怎樣開展弄堂組織？

做民衆工作的人不可少的要具備兩個要件：（一）要知道大衆所要求的是什麼；（二）要把自己也當做大衆之一員。

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開始了，目下民衆所要求的究竟是什麼呢？有人回答：他們要衝到前線去。這個答案是對的，然而並不是完全對的。我相信，中華民族的兒女，大多數人都不怕到前線去，然而在目下已經要求到前線去的，却還是比較少數情緒特別高漲的人。要明白，不怕到前線去是一件事，而馬上要求到前線去又是一件事，這中間是有程度之分的。我認爲，目下大衆所需要的，還不過是消極的不做亡國奴的保障，而並不是積極的衝到前線去。爲了不願做亡國奴，所以大衆都要知道戰爭的消息，都願意做一些可以幫助前線的工作；到了必要的時候，他們也不怕到前線去；但是，在目下，他們還不會提出

到前線去的要求。有這種要求的人數自然也很多，但在百分比上，還只能算是小衆。

因爲這一部分小衆都是頂覺悟、頂勇敢的分子，所以在百分比上雖然是少數，而在力量上，他們却是民族的基幹。只要能把這一部分作爲民族基幹的小衆動員到適宜的方向去盡他們最大的努力，國家便有救了。

所謂適宜的方向，究竟應該如何決定呢？那也有兩個條件：（一）要配合大衆的要求；（二）要謀民族的最大利益。這兩個條件，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一致的，但是實際上並不是完全相同的。因爲大衆所受的政治教育不夠，在原則上他們自然都想爲民族謀最大利益，而局部提出的要求，有時候或者要太低，有時候也許還要錯誤。這便需要基幹的小衆去指導他們或者糾正他們。

但是基幹的小衆，往往也不能依着適宜的方向去盡他們最大的努力。大衆的要求往往是過低，而小衆的要求却往往是過高，而且也同樣的要犯了錯誤。這便需要有比較多一些經驗的人去領導他們。

本月十九日我在立報上發表了一篇由前方主義轉向到後方組織就是希望我們這許多基幹的小衆，能够按照配合大衆要求和謀民族最大利益的兩個條件去負擔起來偉大的使命。那就是說：他們應該趕快用適合大衆要求的方式去組織大衆，在組織好了之後，再把大衆的任務提高起來，以謀取民族的最大利益。目下，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已經把里弄互助會組織方案擬好了，有志的人可以向他們接洽；我現在且把開展這個運動的方法簡單的說一說。

在首段，我已經指出：做民衆工作的人，必須把自己當做大衆之一員。根據這個原則，我以為里弄組織必須從自己的鄰居着手。煽着旗子到別的里弄裏去組織，比較上要困難；因為大衆見了煽着旗子的人，就會覺到和他們自己不同，就不敢去接近他。要呢，除非在里弄組織已經有極廣泛的宣傳和極廣大的展開之後，那時大衆見到里弄組織的旗子，也許不覺得奇怪了。

先和管弄堂的人談一次話，告訴他要維持弄堂的安甯，必須有一個組織，使他明白

這是爲着要減輕他的責任而設的。跟着，再向他調查弄堂裏住戶的職業。進一步，我們去訪問幾位在社會上比較有地位的住戶，和他們談談本里弄互助會的組織，並且要很誠懇的請他們來共同發起，自告奮勇的負擔起來事務的工作。再進一步，就把發起互助會的緣起寫好，張貼在招租牌上。自然，倘使我們已經在弄堂裏有許多熟人，調查和訪問的工作就可以省去了。

緣起發出去之後，倘使有人來接洽，便把他登記下來。一面我們還得拿了防空、防毒常識之類的印刷品，挨戶去分送，在分送的時候，就可以和他們談談組織的問題了。挨戶分送的時候，能邀管弄堂的人同去，那是再好勿有。

會員自然是愈多愈好，但是，一部分一時還不願加入的人，也不必勉強他們。我們就先開成立會，把壁報及其他的工作先做起來。只要態度很誠懇，工作很切實，慢慢的自然大家都會來的。初期的工作，也許這樣就已經差不多了。

## 抗戰以後

抗戰開始了，抗戰的初步勝利已經到手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在國際上已經顯現出來燦爛的光芒。在戰爭未爆發以前，少數人所散布出來的悲觀空氣，被光榮的勝利掃蕩無遺了，民族的自信力重新建立起來了。自然，戰爭的前途是很艱苦的，我們不能希望一帆風順的勝利。我們不害怕一時的挫折，也不驕於一時的勝利。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在這次勝利當中，包含一個重大的意義：牠繼承了「一二八」戰爭，更確實的證明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在戰爭未爆發以前，有些人懷疑國際對於我們的態度，我在那時的意見是這樣：戰爭的最後勝利，主要的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去爭取；國際對於我們的態度，主要的靠我們的決心去轉移。換句話說：要我們自己有力，才能動員國際上的援助力量；要我們自己

有決心，才能堅定國際上的援助決心。半月來形勢的發展，大致和我所說的差不多，而且我相信今後的發展，也逃不出這個途徑。

自從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法國對我們的同情態度，可說是再明白沒有了。蘇聯對我們的援助，雖然還不曾表面化，但是，從她國內輿論所表現的，我們也可以看出幾分的內容了。我們倘使再想一想三十萬的遠東紅軍所對付的究竟是那一國，便可以進一步明白：它是不肯坐視日本帝國主義侵入綏遠的。它目下只須給我們以較小的物質援助，將來便可以節省更大的物力和人力的犧牲。中蘇兩國在蒙古和西比利亞一帶對日本的邊防，在地理上已經存在着二位一體的形勢了。

英國固然也不願中國的完全獨立，然而尤不願日本征服中國。中國完全獨立了，至多不過使印度民族受着一種精神的刺激而增強它的獨立運動。日本如果征服中國了，印度、馬來亞和澳洲都可能馬上受到武力的威脅。因此，在中國未決心抗戰以前，英國利在壓制中國抗戰的怒燄以維持現狀；而在中國決心抗戰以後，兩害相權取其輕，它是甯



可幫助中國的。當然，在戰爭過程中，在初期它還要不斷的進行和平運動；但是，和平的可能性必然要一天一天的減少，一直到它和日本帝國主義破臉為止。

美國的態度是很足以影響英國紳士的態度的。爲了將來的投資，倘美國目下要對中國表示三分好意，英國或者要來表示四分。爲了過去史汀生聯合英國干涉遠東問題的失敗，美國在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特別和蘇聯接近，直接警告日本，間接警告英國。一向極端忍讓的美國，居然爲了旗艦中彈的問題，也鬧得滿城風雨了。美國不能在日本軍事行動中損失一元在遠東的利益；這雖然是第三者的報告，也許足以代表現階段美國的態度吧？那樣的積極性就出於一般人的意料了。英國在這時候，倘使不急起直追，恐怕真不能再過問遠東問題了。但那是它萬萬不肯的。

今後怎樣呢？趨勢已經很顯明了，那就是我們多一分決心，我們的友邦也多一分決心。初步的勝利已經戳穿了所謂「皇軍」的紙老虎了，友邦的決心也許更不成問題了。目下的和平運動會不會有結果呢？我的答案是：日本政府所能提得出的條件，是我

們決不能接受的條件；我們所能接受的條件，是日本政府所決不敢提出的條件。具體點說：日本軍閥決不能容許他們的外交官提出一個比上海協定、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更低的條件，而我們可是已經決不能接受和這三個協定同樣的條件。就是英國，也不會敢用和上海協定同樣的條件向我們提出。這樣，我們最聰明的辦法，自然還是對於友邦的提議不贊一辭，用抗戰到底的決心繼續打我們的死仗，讓日本軍閥去答復它一個不字。

在我們國內，豈止是萬眾一心，而實在是四萬萬五千萬眾一心——抗戰到底。團結的鞏固，可說是歷史上所未有。抗日必然可以統一，已經有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在從前，是主戰者不敢言戰，現在，是主和者不敢言和。即使真有少數人還偷偷摸摸的在那裏進行和平運動，我們不管他們是善意還是惡意，是目的還是手段，可以密切注意，然而不必過分憂慮。我們只須在積極方面鞏固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團結，從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口中同時喊出「抗戰到底」四個字去答復他們。

## 少號召多建議

出獄已經一個月了，許多朋友問我爲甚麼沒有發表過政治的主張，而僅僅不過發表幾篇關於民衆組織設計和時事分析的文章。我的答案是：

第一，在國策還未確定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多作政治的號召，使國策能够早點確定下來。在國策已經確定的今日，我們却應該少作政治的號召，多作積極的建議，使國策可以早點充實起來。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政府既然已經有確定的國策，有點心肝的人，誰還願標新立異以鳴高？大家應該是集中力量，培養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別之見，在明爭暗鬥中再消耗一絲一毫的國力。

第二，國策的輪廓和大政的方針，人民是不能不知道的；國策的詳細內容和大政的具體步驟，人民是不應該要求知道的。好比坐船一樣，目的地是必須問明白的，航線

也不妨問一個大概；但是究竟怎樣經過這條航線達到目的地，我們却只好信任舵師。我們反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專制觀念，然而也絕對不能主張船客可以去干涉舵師的職務。就是典型民主制度之下的議院，參加的也只有少數的代議士，而代議士也不能處處干涉政府的行動。國家在非常的時期，議會往往還要給政府以較大的職權，使牠可以作應急的處置。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特別在這全面抗戰已經爆發的時候，我們爲民族的利益打算，不能不多信託一些政府，使他能够運用較大的權力，同時保守較多的秘密。所以，我們要求民主，但是決不能馬上夢想一個典型的民主時代和環境是必須顧到的。

根據上述兩點意思，我再做一些具體的說明。

比方，中央加緊民衆組織的方針，我們已經知道了；對於黨員「泯絕平日黨內外一切彼此之偏見」的指示，我們也已經見到了。那末，對於民衆組織方面，我們現在就用不着而且不應該再提出原則的「開放民衆組織」的政治號召，而只須在這個原則之下，

從實際方面，多建議一些如何加強民衆組織和如何澈底克服偏見的計劃。因此，我就只能發表一些平淡無奇的里弄組織和職業組織的建議，消極的使後方秩序可以安定下去，積極的使民衆對於前方的援助，可以作有組織的動員；同時，許多青年在「沒有工作可做」的呼聲之下苦悶着的，也可得着一條可以做工作的康莊大道。

再比方，在軍事方面，全面抗戰的形勢已經展開了，抗戰到底的決心也已經由最高軍事領袖明白表示過了。我們以後就只須在全面抗戰和抗戰到底的原則之下，在如何動員全國物力、人力和如何加強國防建設等問題上多做建議的工作。至於一時一地的攻守進退，那是軍略上的問題，是軍事當局的職權，是國家的最高秘密，人民是沒有理由過問的。

再比方，在金融方面，目下已經施行戰時的金融政策了，我們便不必再以「實施戰時金融政策」的口號來號召，而且也不必再來一套聳人聽聞的戰時金融政策以擾亂人心。現在內地貼放辦法已經頒布，五萬萬元的救國公債，也已經決定發行。這表示目下

的金融國策，決不止於消極的緊急應付，而是積極的包含增強國防建設的意義的。消極的緊急應付，不過是過渡時期中一種不可少的處置罷了。自然，這個積極性還很不够，那也許為國力所限，不能一蹴而幾。我們在這時候，也只好在現行的原則之下，在如何運用金融力量推進生產、鞏固國防、動員全國的問題上面，多做一些設計建議的工作，以增加現行金融國策的積極性而充實其內容。應該建議的我們絲毫不必猶豫，而原則上別有主張的却應該特別慎重。倘使我們認為財政金融當局過去的措置還算得當，那末，現在除了多信任他們一些以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人民多多在國策的原則之下建議，政府充分考慮人民的建議，這是上下一心共同對外的唯一辦法。我再提出，我們目下要少號召、多建議；立憲國家平常時期競爭選舉的方式，目下是萬萬不能用了。

## 回鄉運動

我曾經說過：上海不但是全國的經濟中心，而且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在戰爭時間，上海負有領導全國的重大責任。事實上，上海的一個普通店員，回到老鄉去都有許多親友圍繞着詢問時局消息；上海的人力車夫，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比內地一般農民比較明白。在中國受過教育的人是那樣的少；就是有這一些初步政治了解的人，我們也不能否認他們在廣大落後群眾中的領導力量。我們文化人寫起文章來，自然比他們的見解高明得多；但是，全國報紙、雜誌的銷數，恐怕還不會超過二百萬份，影響的力量無疑的還是十分不夠的。我們自然只有儘量動員這許多有一些初步政治了解的人，做廣泛的啓蒙工作。

在目前，上海的嚴重問題是廣大的失業潮，而內地使我們耽憂的，却是農民組織的

散漫和政治水準的低下，漢奸活動就因此得以抬頭。把這許多有一些政治了解的上海失業群衆有組織的移到內地去充實農村的基礎，豈不是「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倘使能動員一些政治水準比較高的人先回去做一些前鋒工作，那自然是再好勿有。

我們所以只主張「回老鄉」而不普泛的主張「回鄉村」是爲着要適應內地的環境，和解決工作人員的生活問題。逗留在中古時代的中國農村，沒有鄉土關係的陌生人，是不容易深入進去做工作的，有時甚至要找一個膳宿的地方都不容易。工作人員的生活問題，自然也要解決，這也只有回老鄉去才能有辦法。我們平時厭惡大家庭，在這時候却只好遷就一些。故鄉的父老，對於這些從前方回來的子弟，至少對於一時的生活是可能給與援助的。倘使這些回鄉的子弟能够對於戰事消息和戰時常識給他們一些報告，在增加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和保護鄉土、維持治安等方面，作有價值的建議，那更可以使他們另眼相看，而認爲在這戰爭時期中，故鄉少不了這一班新人物。

「到什麼社會裏去做什麼人」這是做民衆工作的人的鐵則。所以，回故鄉去的青



年，千萬不可擺出指導者的面目，而應該竭力把自己變成一個當地的普通人物。他們應該設法在當地的小學校和其他公益機關裏去盡義務，在造林、介紹優良種子和介紹新手工業等項目上，做一些提倡、指導的工作。這樣，他們就自然而然的參加生產了。

最後有一點是很重要的：他們必須有組織的回鄉，回鄉以前還要經過迅速而周密的討論和研究。否則倘使用「遣散」的方式送回去就算，那是不會發生力量的。有思想的青年也決不願那樣做，因為以後文化上的飢餓和精神上的孤單，是要使他們苦悶到不能忍受的。我們必須有一個聯絡的機構，使大家可以報告工作，可以提出工作上的困難問題要求解決，還可以經常的知道這一個運動進行的狀況。自然，這個聯絡的機構至少每週要發一次通信，一面報告給他們時事消息和工作進行，一面指示他們工作方法，並要求他們報告工作情形。

這是我對於回鄉運動的一些意見，希望大家趕快注意這個問題。

(二六·九·四——立報)

## 合理的統制

全面的戰爭已經開始了，一切經濟、社會部門的工作，都應該有一個統制，那是誰都贊成的。尤其對於後援的工作，統制的需要可說是特別的大。因為，後援工作和戰爭有緊密直接的關係，是一絲一毫都不能鬆懈、疏忽的。

但是，所謂統制，是要有高度的積極性的；是要指導人民行動而且鼓勵人民行動的。倘使消極性太多，使大家在制統之下不敢動或者不願動，那個結果是十分悲慘的。

目下所最使我們憂慮的，便是一種「因噎廢食」的觀點和根據這種觀點而形成消極的統制。比方，許多後援工作不敢讓民衆參加，而且不敢讓民衆接近，所提出的理由便是「防止漢奸搗亂」或者「恐有流弊」。自然，漢奸是有的，但是數量上總不會占全體民衆的百分之一；流弊也是有的，但是比例上也總不會超過利益的十分之一。因為

不到百分之一的漢奸而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民衆行動停止了，因爲不超過十分之一的流弊而把十分之九的有利工作停止了，這還不是因噎廢食嗎？這還不是國力民力的重大損失嗎？

舉點事實來說明吧。人民對於抗戰將士的捐助，不能像從前一樣誰拿到歸誰分配，而應該讓政府統盤籌劃、公平分配；對於前方給養和軍用品的供應，不能像從前一樣亂買亂送，而應該讓政府集中能力、大量購買、適當分配；這都是很對的。但是，人民要對前方兵士有一些直接的表示，也應該鼓勵他們做，而只須告訴他們：性質應該限於慰勞，條件以省費而能激發士氣者爲宜。（像本市抗敵後援會所提倡的慰勞袋，就很合格。）這樣把捐助軍費和贈送慰勞品分開了，前者希望數目大而能夠集中，後者希望耗費少而能夠直接到前方去；既不枉費國力，又不使人民向隅，豈不是兩全其美嗎？又如前方急需的物品，自然也可以隨時公告徵募，使人民可以直接供獻，而不能以集中的理由，一概抹煞，轉致貽誤軍事；這種通融也是應該有的。

其次，人民對於傷兵的慰勞，是那一個國家都鼓勵唯恐不及的。但是，目下便有人恐怕漢奸向傷兵刺探軍情，也有人恐怕傷兵過受優待，反致消沈抗敵勇氣，還有人又怕物品不易公平分配，更有人怕慰勞人多，使傷兵疲勞，因此主張不要民衆慰勞。事實上，這四種流弊，是那一個國家都有的，然而都是有法補救的。漢奸人數不會占全體民衆的百分之一，上文已經說過了。傷兵因民衆的熱烈慰勞而消沉抗敵勇氣，說來似乎太奇特；縱使有，也決不會超過百分之一吧？而且還有監察的辦法。多數人，自然還是愈慰勞愈奮發，決不會因慰勞而反消沉。這樣，誰能相信這是一個拒絕民衆慰勞的理由呢？我以為我們只須限制談話，限制慰勞品種類，（不使有太奢侈和不易分配的物品，）再限制每日慰勞人數，由各團體合理分配，這四種可能的流弊就都不會發生。

此外，據說前方傷兵的救護，人手還不够，而後方願意到前方去救護傷兵的人，甚至願意步行出發的人，竟至投效無門；那個理由，據說也是爲着要防止漢奸。諸如此類，聽到的真是不少。簡單的說來，終不外是以少數抹煞多數，因噎廢食！

「統制」兩個字，也有代以「合理化」三個字的。的確，統制是不能不合理的；不合理的統制，結果是消滅！因為少數的漢奸活動而阻礙多數的民衆活動，因為偶然的流弊而一筆抹煞必然的利益，那還不是消滅嗎？所以我不能不痛切的陳辭，請大家加以嚴重的注意。

我萬分懇切的希望大家放棄彼此派別的偏見，在合理的統制之下，動員一切的人力、物力，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

(二六·九·六——抵抗)

## 論戰時金融

戰時金融是什麼？

簡單的說，是用金融的力量，去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應敵。詳細點說，是（一）節約私人的消費以充實戰爭經費，（二）節約商業資本以充實農工業資本，（三）節約非國防工業資本以充實國防工業資本，（四）維持物價、穩定匯價、保護金融機構以增強抗戰力量。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就可以明白：戰時金融決計不是很機械的提出「膨脹」或者「緊縮」的名詞，就可以概括一切的。戰爭時期通貨應有適度的膨脹，那是沒有問題的；但決不是一般人想像中的濫發紙幣方式的惡性膨脹，而是有意義、有辦法的膨脹；也決不是籠統、普泛的膨脹，而是膨脹之中要有緊縮的。

先就國家和人民間的關係來說，自然是國家的財政要膨脹，而人民的用度要緊縮。

但是，就在國家財政當中，除了軍事費和國防建設經費必須大量膨脹外，一般的行政經費也是必然要緊縮的。

其次，就生產和消費的關係來說，自然是生產的方面要膨脹，而消費的方面要緊縮；就商業和農工業的關係來說，自然是農工業的方面要膨脹，而商業方面要緊縮；就沿海口岸和內地的關係來說，自然是內地應該膨脹，而沿海口岸應該緊縮。所以說到農工商業，那情形是更爲複雜，而處置更要精密。比方，雖然我們應該在農業方面膨脹，但也只能鼓勵食糧生產，而不能過分鼓勵旨在供給海外市場的棉花生產，更不能鼓勵鴉片生產。就是食糧，也不能無條件的供給商人以資金，使他們可以大量囤積居奇；而只能在國家管理食糧法令的範圍之內，准予受押。對於工業和礦業的通融，除了依照國防是否必需的條件安排先後次序以外，還要視其所在地是否爲安全地帶，而加以區別。甚至一般商品的受押，也不能違此標準。像過去把全國工業集中在上海，把軍需用品也集中在上海，那種狀態是不能讓牠繼續的。

要之，在膨脹的方面，消極的要不要浪費國力，積極的還要能增強國力；在緊縮的方面，消極的要不要消耗民力，積極的還要能積蓄民力。我們要在戰時金融國策之下，鞏固國防，動員生產，使全國人人有工做，有飯吃，使壯丁個個配稱壯丁，兒童個個會成爲將來的壯丁，那才能持久抗戰，而取得最後的勝利。

自然，這一個偉大的計劃，是不能一朝一夕實現的，我們祇能希望一步一步的做；在開始做的時候，一時的紊亂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也祇能一件一件的補救。我曾經說過，戰時金融政策已經開始實施了。這個實施的程序，是先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把平時漫無限制的膨脹的門戶，一齊先閉塞了，然後再依照國防的需要，一道一道的重新開啓。應該開啓而原來沒有的，我們祇可開闢新的門戶；原來有而不合用的，我們祇可就此不開。倘使說戰時金融的話，我敢說各國的先例都是如此這般，至多祇是時間上有一些遲早之別罷了。

從上月十七日開始的限制支付，到旬日以來由開放內地貼放而開放小額存款，而



開放典當存款，再到最近擬議中的酌量開放本埠工商業貼放，我們不能不說財政金融當局正在逐步執行這正常的戰時金融國策。自然，在限制付款過程中，許多人會感到不方便；但是，我們也得想想，倘使不如此，金融機構能夠到現在還不發生破綻嗎？物價的高漲，能如此而止嗎？資本不又已經大量逃避嗎？至少，過去三星期中的金融國策，已經完成了大部分的消極任務；那就是，保護金融機構，節約個人消費，限制物價飛漲，和阻止資金逃避的任務。我們必須明白：從平時金融轉變到戰時金融，一些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別的國家在經濟恐慌時期都要停止支付，我們當這樣的空前難局，難道還不該有一個限制付款嗎？我們既然不惜任何犧牲準備抗戰到底，那末，這一些痛苦，除了咬緊牙關忍受以外，還有何說呢？我們且再想一想，目下前方將士是在過怎樣的生活，後方難民又在過怎樣的生活。我們對於這一些身受的痛苦，難道還不應該甘之如飴嗎？尤其在上海的人，這時候必須放大眼光，看到上海在整個國防中是處在如何的地位，想到今後有沒有我們安居樂業的時候，再判斷在戰時金融的意義之下，我們應該不應該祇顧到一隅的利害

和自己的事業，而要求在上海施行膨脹。時代空前的激變了，我們還能保持平時苟且偷安的心理嗎？

爲了感受到限制付款的痛苦，便主張澈底開放付款限制；爲了要補救開放付款限制以後資本逃避的危險，便跟着主張統制外匯和發行流通券。簡單的說：目的祇是要求一個膨脹。我再要鄭重的指出：開放付款限制的危機，並不僅是資本逃避，而同時是個人消費的漫無節制，物價無限制高漲，和金融機構的發生破綻。那結果，恐怕破壞戰時金融則有餘，回復到平時金融則不足，所以這種主張，在方法上是非驢非馬，在結果上必然要進退失據。

外匯應否統制，流通券應否發行，那是另一問題；但不能以統制外匯和發行流通券做澈底開放付款限制的手段，却是鐵一般的至理。因爲，戰時金融根本就不容許澈底開放付款限制。但是，只要付款限制不撤銷，外匯一時就沒有統制的必要；將來，只要華僑能够踴躍承購救國公債，只要民衆組織一天一天的嚴密起來，能够檢舉購買外匯者而課

以新頒的重典，統制外匯也許根本不需要。倒是在目下高倡統制外匯，反足使華僑匯款承購公債者裹足不前。忘記了通貨膨脹對物價的影響，而主張發行流通券，尤其是萬萬不可。這兩個問題，內容很複雜，且俟將來詳加論列。

對目下金融國策不滿的論調，大概有兩種：一種是根本反對限制付款的，一種是認為限制付款以後的積極開門工作還不夠的。前一種是錯誤的，上文已經檢討過了。後一種是必須重視的，然而我也有一點意見。我們應該迅速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應敵，這個原則是誰都同意了。那末，我以為感覺目下金融國策積極性還不夠的人，還是應該從大處着眼，趕快提出一個全國動員的方案，請求政府採納，再依據這個方案，有條理、有步驟的發動金融力量去執行動員以充實金融國策的積極性。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案，而只是枝枝節節的要求積極性，即使有一些效果，也不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病。讓我們多注意全國動員的整個方案而暫時少談局部的金融問題吧！

## 現階段的救亡工作

「八一三」的炮火，已經揭開了全民族抗戰的血幕。目下的問題，已經不是戰不戰的問題，而是如何戰和如何保證最後勝利的問題了。

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基礎建築在民衆力量上面，這是誰都同意的一個原則。但是，一個多月所給與我們的印象，却是民衆的力量趕不上軍事的力量，這是使我們萬分擔憂的。

目下民衆力量薄弱的現象，簡單的說來，是供給和需要不調和，是動員工作和組織工作都不够。因此，有些方面需要人的力量，然而沒處找；同時有許多人要供獻他們的力，却是沒有路！這種現象反映到民衆方面來，便變成上層消極，下層苦悶！前方將士在那邊詛咒民衆沒有力量，那裏知道後方有千千萬萬的民衆正在那裏感慨投效無門呢？

上層之所以消極，自然是因爲動員得不够，或者動員得不好。我們倘使真要動員全民族的話，自然要動員社會上一切的領袖人物，同時要動員社會上一切的原有機構。那我們對於人的方面，就應該細密的分工，使每一個領袖人物都能負擔一部分適宜的工作，而不僅僅是掛名了事。對於各種機構，不但要普遍動員，而且還要保持原有的領導體系。比方，倘使我們要動員某一業担任某一部門工作的話，我們還是先找該業的領袖人物，而不要先找二流的人物。這似乎也太保守了，但是，要明白，我們目下對內還只好保守一些，免得擾亂了原有的領導體系，一時反而動員不起來。我們保持原有的系統來救國，並不是保持他們去欺壓平民。

在這裏，我們一面批評動員不够，動員不好，一面也不能不責備一些那班消極的人。救亡工作是大家自己的事，何必別人來動員才做呢？救亡工作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又何必別人來分配呢？我們用不着別人來動員，也用不着別人來分配工作，而應該是自告奮勇的搶着來做，別出心裁的想出方法來做。既然是有地位的上層人物，只要有這種精神，

會怕沒有事做嗎？至少，籌募的工作是不怕人多的吧？

下層之所以苦悶，一部分是動員得不够，而一部分却是自己不肯做艱苦的工作。所謂動員不够，有些是固執着門戶之見，有些是犯了「恐漢奸病」。

俞鴻鈞市長曾經說一句很沉痛的話：「大家似乎並不是要救國，而只是要救自己的團體。」爲了把團體的利害擺在第一位，所以有些團體有做不了的工作，然而不肯動員別的團體去做；有些團體一定要用自己的旗幟才肯動員，而不肯接受無名的動員。總而言之，是要自己團體的招牌響亮，是要自身的領導地位提高，前方的利害和民族的前途，都把它擺在一旁了！這種門戶之見，實在使人太痛心了！我想大家應該學學「無名氏大善士」的風度才好。

現在漢奸問題中的最嚴重部門，並不在漢奸活動本身，而在普遍的「恐漢奸病」。我相信，中華民族的兒女，做漢奸的決不會有千分之一。但是，現在有人却因爲極少數的漢奸活動，竟要疑神見鬼的到處怕漢奸。有些人在路上看見一個形跡可疑的人，便馬上

當他漢奸攢毆至死這種不合理的舉動，經過輿論的嚴厲指摘，現在已經好了一些。另外有些人因為要防止漢奸，根本便不敢接近民衆；也有人利用防止漢奸的名義，來壓迫民衆運動。——據說各地竟有很熱心愛國的人，被軍政當局當做漢奸拘捕的。我們且想想：倘使中國真會有這許多漢奸，中國還有救嗎？我們制裁漢奸，必須用很周密的方法和很清明的態度，不要冤枉一個人才好。否則昏天黑地，隨便把漢奸的帽子戴在別人的頭上，弄得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敢怨而不敢動，中國還有救嗎？

恰恰相反的，我們要消滅漢奸，必須更積極的動員廣大的民衆。只要廣大的愛國民衆都活動起來，少數的漢奸便自然不能活動。我們不分派別（火燒到二門了，救火的時候還要分派別嗎？）儘量動員已有組織的民衆，使他們擔任清除漢奸的任務；同時加緊組織沒有組織的民衆，以擴大民衆的力量。在有組織的民衆當中，漢奸是不可能匿跡的；在長時期的集體生活中，相互的認識可以揭破種種一切的漢奸面具。

上面已經說明了下層的苦悶，是因為動員的不够。現在再問：別人不動員我們，我們

是不是就需要苦悶呢？當然不需要。我在去年就說過：我們有做不完的喚起民衆和組織民衆的工作；我們應該把喚起民衆和組織民衆做我們的經常工作，而把開會、示威等行動，當做我們的臨時工作。我現在還是這樣主張，不過過去是開會、示威，現在改成前方工作罷了。

救亡工作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做的，而並不是一定要搭起舞台來表演的，更不是神話般的由天上掉下來的。回到家裏去，便要看一看家裏的人有沒有全體動員；跑出門，便要看一看弄堂裏的人有沒有全體動員；到寫字間裏去，再看一看同事同業的人有沒有全體動員。倘使沒有的話，便應該去喚起他們，去組織他們，使他們能夠動員。動員起來做什麼工作呢？給前方兵士的棉背心，不怕做得太多，救國公債和其他捐款，不怕募得太多，那裏會怕沒事做呢？

或許有人認爲目下的後方工作做得不滿意，因此不肯熱心工作。自然，誰都不能否認目下有許多事情做得不够，或者做得不好，但這就靠民衆的力量去糾正他們。我們一



面要積極的動員我們的力量來做，一面不斷批評，不斷建議；而絕對不能一面隔岸觀火的站在一旁，一面只管冷譏熱嘲的說風涼話。只有民衆在工作上拿出力量來，民衆的呼聲才有力量；也只有參加工作，那個批評或建議才能切合實際，才有價值。我在這裏還要指出：我們在工作時候，不可忘記了組織的任務。我們在募捐的時候，只要見到一位特別熱心的人，就應該立刻動員他參加工作，參加組織；倘使他是在弄堂裏面有領導地位的人物，就應該推動他組織里互助會。那樣，到第二次募捐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通過互助會的關係，而動員整個的弄堂了。我們必須這樣的在工作中組織，在組織中工作，然後組織可以一天一天的擴大，工作也一天一天的發展。

我們要明白自己的責任，決不是個人的犧牲，而是動員更廣大的群眾一同去犧牲；更要明白鬥爭的時期是很長久的，更艱苦的階段還在後面。我們目前千萬不可因為不能奔赴前方就感覺到苦悶，而要認定後方的後援工作和組織工作實在是特別的重要。我們應該把後方的組織工作當做經常的工作，應該在努力經常工作中準備隨時動員

到前方去，而不能在期待前方動員中忽略了更重要的組織工作。我們要準備負擔起來更艱苦階段的任務，準備在那時候發揮更大的力量，而用不着急於犧牲，更不應該因請纓無路而苦悶、消沉。

(二六·九·二三——抵抗)

## 反求諸己

在過去的幾天當中，因為美國對遠東的態度不够得嚴正，激動了全國上下的抗議。這種抗議自然是很對的，但是我覺得在抗議之後，對於我們自己的外交態度，也得檢討一下；同時，一面抗議，一面却不必有絲毫的悲觀。

我曾經說過：要我們自己先下極大的決心，我們的友邦才能對我們下援助的決心。我們的決心，在軍事上已完全表現出來了，在輿論上也已經完全表現出來了，在外交上却表現得還不够。比方，駐日大使許世英，為什麼還依然留在東京呢？再比方，最近還主張承認「滿洲國」與日本言和的胡適之博士，究竟是誰派他出去做國民外交代表的呢？

我並不願意提出過高的對日宣戰的要求。但是駐日大使的逗留東京，却真想不到有什麼理由。倘使真有莫測高深的理由，那我就只好緘默；倘使不過是少數親日分子

想留這一扇門做妥洽的地步，那却是違反國策的行動，我們做人民的就不能不糾彈他們。

現在，整個的國策已經明朗化了，部門的外交政策却不够明朗化。全國國民相信明朗化的國策，所以都相信政府決心抗戰到底；但是友邦是重視外交政策的，外交政策不够明朗化，就容易使友邦不肯下更大的決心。這一點是我們必須「反求諸己」的。

不但下決心要「反求諸己」，抗戰的力量也主要的要靠自己。我們說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就是說我們自己的力量也可以取得最後勝利；友邦的援助，不過使我們能以較小的犧牲，取得較早的勝利罷了。我敢說：只要我們能够把戰爭變成持久戰、消耗戰，只要我們把日本帝國主義的紙老虎多戳穿一些，使英美兩國有把握，一旦他們職合干涉，一定可以在六個月之內使日本帝國主義屈服，而決不至變成一個長時期的世界戰爭，國際形勢的好轉是不成問題的。誰說在地中海、英法兩國可以合作制裁西方的海盜，在太平洋、英美兩國就不能合作制裁東方的海盜呢？

我重復的指出，只要我們在外交上再表示決心，只要我們在抗戰上繼續努力，國際關係是用不着悲觀的。

(二六·九·二五——立報)

## 再論戰時金融

「金融是國家的血液，不是誰家的私財；金融機構是國家的心臟，不是誰家的店舖子。」這是我從前說過的一句話。

根據這個原則，我曾經要求：平時金融要為國際收支和國民收入打算，而不能專為金融部門的損益和利害打算。

我現在進一步要求：戰時金融不但要為國際收支和國民收入打算，而且要為增強國力和培養民力打算。

金融機構是整個經濟機構的中心，金融的力量，應該是一切經濟活動的領導者。金融對那一業緊縮，那一業便往往要衰落；金融向那一地膨脹，那一地便往往會繁榮。比方倘使過去兩年間金融機構不向棉花押款膨脹，便沒有今年棉花生產的過剩；再比方，倘

使過去兩年間金融機構能够在上海對五金業緊縮，同時在南京對五金業膨脹，五金業的存貨一部分就可以移到南京去。我們只要在膨脹和緊縮之間很巧妙的運用，就已經可以受用不盡。

正是憑着這種巧妙的運用，金融才能替國際收支打算。舉一個例子來證明吧：在兩年以前，三家的華商航業公司因為受不了三家洋商航業公司在長江路的競爭，就和他們訂定了一個營業協定。那時候倘使我們的金融機構能够供給華商航業公司五千萬元的流動資金，使他們可以繼續競爭下去；那末，到後來華商航業公司虧損了五千萬元的時候，洋商航業公司或者也要虧損五千萬元。那結果，金融機構雖然要吃着五千萬元的呆帳，然而洋商却要少匯回去五千萬元的在華投資收益；我們在國際收支上，就占了五千萬元的便宜。所以倘使打店舖子的小算盤，這件事不能做，而打國家的大算盤，這件事却應該做。

怎樣可以為國民收入打算呢？倘使金融機構貸給進口洋商一百萬元的資金，輸入

一批消耗品，外國製造廠家便在那中間賺進十萬元的利潤。那結果，我們就替別人增加了國民收入，而減低了自己的國民收入。如果把這一百萬元貸給中國廠家，使他能夠動員一萬人去生產，而得着十萬元的利潤，我們就增加了自己的國民收入。我們貸出一百元動員一個不生產的人去生產，只要他能生產出來一百零一元的價值，那多出來的一元便是國民收入。

說到戰時金融，那個任務自然是格外高。在平時我們還可以在金錢的數字上打算，所以必須想到國際收支和國民收入；在戰時，我們簡直不能專在金錢的數字上打算，而首先要顧到一個「力」字。在平時，金錢可以變成「力」；而在戰時，金錢不一定可以變成「力」。海岸被封鎖是一個問題，遠水不救近火又是一個問題。

爲了要把「力」字擺在第一位，戰時金融在生產方面，應該根據自足、自給、自衛的原則，加緊充實國力，而不能一味計算成本，也不能一味計算收益。比方，我們明知道某種商品自己生產起來成本大，不如進口來得合算；然而爲了國防的需要，還是只好硬着頭



皮鼓勵大家去生產。像德國用極大的成本去生產人工橡皮和煤煉汽油，我們在自衛的意義之下，是應該仿效的。再比方，有些設備明知道沒有生產的意義，然而爲了國防的需要，我們也只好鼓勵大家去設備。如各都市的防空設備，不管是公共的或是私有的，只要能保障國力，我們就應該通融資金鼓勵大家去做，而不能再計較這一筆投資的生產性和穩妥性。倘使救火還打水的算盤，救病還打藥的算盤，用平常腦子去應付非常時期，那是萬萬不可的。

其次，爲了把「力」字擺在第一位，戰時金融在人力方面，應該根據「要使全國壯丁個個配稱壯丁」的原則，（見本月七日本欄拙作論戰時金融）把培養民力當做主要任務，而不能一味打算國民收入。在平時，貸出一百元動員一個人，至少要希望他生產一百零一元的價值；在戰時，那怕只能生產九十八元的價值，不得已的時候也只好硬着頭皮做，爲的是使要這個人能够在生產中養活自己，訓練自己，而變成一個有用之人。這在金錢數字上雖然吃了虧，然而在培養民力方面却得着了收穫，總比消極的救濟來得

有意義。

怎樣來實現這個戰時金融原則呢？我依然希望大家把整個的金融國策方案擺在第一位，而不要把籌碼問題擺在第一位。因為目下誰都不反對增加籌碼，問題只在如何的增加，才能消極的可以防止惡性膨脹，積極的可以達到增強國力、培養民力的目的。在設計方案的時候，更應該牢牢的記着「國防中心」四個字，而不要只看見一地的榮衰和一業的利害。

比方，說到上海，自然大家都覺得失業問題很嚴重；但是要解決上海的失業問題，治標的只能先予救濟，治本的只能向內地設法。在國防意義之下，要在上海再來一次膨脹，再造成一個買辦性的虛偽繁榮來解決失業問題，那是萬萬不應該，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在上海緊縮，在內地膨脹，逼令許多工商業者向內地遷移；同時內地金融流通了，上海的失業者到內地去，也容易解決生活問題了。

向內地膨脹的時候，在工業方面，我們自然要儘先恢復工廠生產和採礦事業，加緊

的提倡手工業，同時進行「輕工業的家庭工業化」以容納一部分的失業工人；重工業建設，自然也要在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做，以建立起來自足自給的基礎。在農業方面，第一我們自然應該注意糧食的收集，以鞏固國防；其他的抵押可以酌量的做，以維持農民生計；但是種棉的人今年要吃大虧，却已經是定案，那只好向主張中日經濟提携的人們去算帳了。我們自然還要在開墾荒地、增加耕地的工作上努力，以容納別一部分失業的人。此外對於內地的文化事業和教育事業，也應該儘量的鼓勵，使到內地去的知識分子和青年不至有失業、失學的苦悶。這是我們的精神國防，是不能稍加忽畧的。目下內地貼放已逐漸推廣，文化機關的遷移也已開始實行，而且聽說政府還要進一步調整農產工廠和貿易，我相信在短時期內一定有更多的事實表現出來，以慰全國嗚嗚之望。

最後，我希望大家對於我們的戰時經濟，絲毫不必悲觀。我敢說，我們的戰時經濟真好比是「旭日東昇」而敵人的戰時經濟却是「日暮途窮」。在我們利用戰爭的機緣，正可以把平時的買辦經濟和奴隸經濟的臭皮囊拋到汪洋大海裏去，而跨進國民經

濟的大道。我們有無限的人力可以動員，有無限的資源可以開發；只要運用目下已經振奮起來的人心，發動已經集中起來的金融力量，去開發這無限的資源，真是打一天好一天，進一步光明一步。而敵人呢，平時經濟已經到了山窮水盡，逼不得已才來一個侵畧的軍事投機；資源本來貧乏，壯丁的徵發又要使生產機構趨於破滅，回光返照的戰時經濟早已露出來最後崩潰的朕兆。

我們要忍耐着目前的痛苦，這是嬰兒墮地前後產婦應受的苦難。政治上已經展開了偉大的新時代了，讓我們在經濟上也來展開一個偉大的新時代吧！我們要擡住了創傷，勇往直前的奮鬥，最後的勝利必然是我們的。

## 今年的棉花問題

爲了要進行中日經濟提攜，便想把中國變成產棉國；爲了要把中國變成產棉國，便儘量發動金融力量，向棉花押款膨脹：這是過去的事情。但是就因爲金融力量向棉花膨脹，便有今年棉花生產的過剩。

兩點：  
在中日經濟提攜高唱入雲的時候，我曾經幾次的著文反對。我那時候所提出的有

第一，在國防的意義之下，我們不能再使種糧食的田地改種棉花；否則一旦海岸被封鎖，我們將不敗於戰爭而敗於飢餓。

第二，就放開國防不談，我們也不能再使我們的農產國際商品化。我們沒有海軍力量保護海外市場，國際貿易上的利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遠一些古巴的糖和巴西的咖

啡，大恐慌以後國際市場杜塞，只好拋棄到海洋裏去；近一些我國的生絲出口，因為受日絲的壓迫，一落千丈，只好砍了桑樹當柴燒，都是前車之鑒。所以，我們還是多種一些自足自給的糧食，而不必想在農產國際商品化上面發橫財。

目下的棉花問題，便是國際商品化的問題；而目下棉花問題之所以特別嚴重，便是因為在國防意義之下，我們不能再把過多的金融力量，安排在棉花押款上去。

今年的棉花產量，是一千九百六十萬擔；倘使平均以三十元一擔收買，（最近還有人以平均每擔四十元估計；但目下有些地方的仔花價格，已慘跌至十元以內，則棉花收價，自決不能有如是之高。）就差不多要動用六萬萬元的資金。棉花的生產，差不多是全部商品化的。那一個農民種棉花是為着供自己消費的呢？因此，在調整棉花的工作上面，我們不能不以全部收買為前提；這才需要偌大的資金。糧食的問題就不同。全部糧食生產的價值，自然比棉花大得多；然而商品化的部分，恐怕還沒有棉花那麼多。所以，從國防的意義來講，糧食是首先應該調整的農產，而從金融的力量來講，糧食又是比較容易調

整的農產。

因為戰爭的爆發，國內四分之三以上的紗廠停了工；再因為海岸的被封鎖，出口變成極端的困難。因此有人估計今後一年間的銷數，連少數的出口在內，至多只能有八百萬擔。那樣，即使明年的產量打一個對折，後年的產量再打一個對折，陳陳相因的棉花存貨，要經常的在一千萬擔以上，繼續至三四年之久。那就是說：這六萬萬元的收集棉花款項，大半要變成長期呆帳。現在急如星火的軍需用款是那樣的，多，我們那裏能有這借大的閑資去囤積這種不急之物呢？

中國的棉產，內銷的本來一小半依賴日紗廠的購買，而出口的却全數依賴日本市場。簡單的說，是敵人可以隨時制我們的死命的。這種向敵人賣身投靠的農業政策，到抗戰時期要碰壁，自然是不成問題的。這一個毒辣的陰謀，這一個經濟提攜的毒藥，幸虧抗戰發動還不太遲，幸虧我們吃下去還不很多；否則曠日持久，再讓產量增加一倍，那我們就真只有死路一條了！

過去的事不必多談了，且想想今後的辦法吧。從國防的直接意義來講，我們固然不能重視棉花市場的調整；然而，爲農民生計着想，我們又不能不很嚴重的考慮這個問題。我們明知不應該在抗戰時期中把有限的資金去囤積不急需的棉花，然而爲培養民力起見，又不能對種棉的農民坐視不救。這才是最痛苦的事情。依照目下的形勢，恐怕將來的發展必然是農民吃大虧忍痛脫手，而政府還要費大力忍痛救濟。目下海外棉價大跌，孟買粗絨花市價僅合國幣二十元一担；所以，種棉的人對於去年的市價，是不能再去憧憬他了。爲了使明年的棉產自然減少，恐怕在政策上也要使種棉的人比種糧的人吃虧。所以，調整中預定的價格，決不能和去年的棉價比較，而只能和今年的糧價比較，如果種糧食的每畝的收入是十元，種棉花的必然要使他少於十元。

收押的方法，最好是勸導農民自動的組織起來借款聯合會，直接向金融機關請求抵押，以免居間人從中上下其手。國家銀行除了開放轉抵押門戶，鼓勵商業銀行及錢莊承受抵押外，最好再多多委託這些私人金融機構爲代理處，以資推廣。農產調整機關除



了幫同農民組織借款聯合會之外，還要替他們解決運銷問題和一般技術問題。抵押的時候，可以照假定價格打七折；押餘的三成，等賣了之後攤還。我認爲抵押的範圍要普及而抵押的價值却不必高；目下最緊要的是給農民一些希望和一些救急的資金，並不一定要一次給他們很多的。

據說，將來在打包和儲藏方面，恐怕還要發生很大的困難。出口和準備長期儲藏的棉花，必須機器壓榨包裝；否則出口的裝船不便，而儲藏的不但所占地位過大，而且也易於着火。但是，壓榨包裝所需的材料如蔴袋、鐵皮等，目下均感缺乏；遷就了棉花的需要，或者便要妨礙軍事上的需要。同樣的，因爲軍事上的需要，我們必須囤積大量的糧秣，我們就需用多數的倉庫；但是，大量棉花的儲藏，就要使倉庫容量不容易安排。

總之，一切的一切，我們都受了中日經濟提携之賜！這一個亡國的農業政策，使我們增長了嚴重的內部矛盾；使我們顧到國防，就幾乎顧不到農村經濟。然而，這還算不幸中之幸，我們不會因此亡國。我們一面咬緊牙關，忍受着這種痛苦，一面還要知道，而且要使

大衆知道，這一部分的痛苦是妥洽政策所造成的。我們要自拔於奴隸經濟，永遠不再受這種痛苦，便只有排除一切的妥洽論，抗戰到底，以達到最後的勝利。

(二六·一〇·二——申報)

## 今年的雙十節

年年的國慶，幾乎把雙十節弄得黯淡無色了！到今年才重新放出來一些光芒。

我們已經過了二十五個雙十節，那中間，在內戰的炮火聲中過的次數恐怕不少，而在對外的抗戰聲中過雙十節，今年却是第一次。

海通以後，我們也曾經遇到過幾次的對外戰爭，但都是一戰而敗，一敗而和。這一次的對外戰爭顯然是不同。假使從「七七」蘆溝橋抗戰算起，到現在而經支持了三個多月；就從「八一三」上海抗戰算起，也差不多已經兩個月。自然，兩個月、三個月算得什麼呢？我們現在全國一致，都準備抗戰到底，一直到最後勝利的一天。

這是特別值得我們慶祝的；但是慶祝當中要帶着嚴肅的哀矜。

想一想華北形勢的嚴重，應該知道我們的任務是多麼艱苦；簡直每一個人每一秒

鐘都要把鬥爭放在心上，才算盡了做國民的任務。再想一想壕溝裏面的戰士，他們所做的是怎樣的工作，所過的又是怎樣的生活，我們更應該怎樣的激勵自己。

今年的雙十節，光明已在我們的前面，但是需要我們用血和肉去取得這個光明！

(二六·一〇·一〇——救亡漫畫)

## 負擔起來新時代的艱苦任務

二十六年以前的今天，我們爆發了對內要求解放的神聖戰爭；二十六年後的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着對外要求解放的神聖戰爭。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極偉大的兩個階段，而這兩個階段的劃分，是有他的必然性的。

求解放是本能的，是不會中止的。有了二十六年以前的神聖戰爭，就必然會有目下的神聖戰爭。我們要告訴一切民族的敵人，一切人類的惡魔：公理、正義最後必然要得着勝利，被壓迫者最後必然要抬頭，任憑你們怎樣窮兇極惡。

反過來說，倘使沒有二十六年以前的神聖戰爭，就不可能有目下的神聖戰爭。阿比西尼亞爲甚麼結果要失敗呢？那固然有許多的原因，但是帝王的封建統治負不起民族解放戰爭的任務，却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二十六年以來的中華民族雖然中間經過了許

多的迂迴曲折，雖然有許多事情使我們痛心，但是，畢竟誰都沒法阻止時代車輪的前進，我們畢竟已經進步得許多。因此，我們可以很自信的負起了向外要求解放的神聖戰爭的使命，而且必然可以取得最後的勝利。

十個月來，因為抗戰國策的明朗化，我們內部已經有了空前的團結；兩個月來，因為抗戰決心和抗戰力量的表現，國際上已經有了空前的同情的確，我們是進步了，我們對於勝利的前途，是有把握了。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戰爭，如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之役、庚子之役，都是一戰而敗，一敗而降的。像這次的連挫敵鋒，再接再厲，軍事上所表現出來的力量，也是空前的。這是團結以後的偉大力量，只有這種偉大的力量能取得國際上廣大的同情。我們今天能過一個比較有意義的雙十節，誰說是偶然的呢？

但是，做政治工作的人有兩句片刻不能忘記的名言，那就是「死裏求生」和「安不忘危」八個字。前一句話是說在悲觀空氣籠罩的時候，我們要能很鎮定、很堅決的信心自己前途的光明，把對我們不利的條件轉變成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後一句話是說在

樂觀空氣洋溢的時候，我們要很嚴肅的顧慮到可能的危機，用「肆應機先」的手段去消弭這種危機。根據這種原則，我在過去妥洽聲浪甚囂塵上的時候，就常常對朋友們說：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不過我們的鬥爭過程是很艱苦的。現在，是主和者不敢言和的時候了，我要對朋友們說：我們的前途是更光明了，然而我們的鬥爭是更艱苦了。在這比較有利的環境當中，我們應該格外想到自己責任的重大。

先就國際形勢言，我們應該明白：敵人是不會束手待斃的，牠是要用全部死力，種種手段來破壞我們的國際聯合戰線的。很可能的，它要在最近的一個時期當中散放許多和平妥洽的空氣，使我們的友邦不相信我們的抗戰決心，因而重新徘徊猶豫起來。自然，倘使我們能多多的表示決心，就可以堅定友邦的信心。像蔣委員長最近的表示，對國際上的影響自然就很好。不過，我們還希望能進一步的和敵人斷絕國交，在外交步驟上表示義無反顧的決心。同時，我們還要防止親日官僚和敵人暗中往來，以證實敵人和平安妥洽的謠言。我們要提出一個口號：「主和的就是漢奸！」

再從國內形勢言，在華北，因為有不服從中央命令執行抗戰的軍閥，以致有軍事上坐誤戎機的惡果；再因為有只圖私利的官僚、政客、的活躍，以致某一部分地方和中央間，還不能有「身使臂，臂使指」的運用；此外因為個人地位的企圖，使最高當局發生人事上應付為難的事實，也是我們所痛心疾首的。要之，目下「上下一心」是做到了，中層却存在着極大的問題。把持個人利益不顧民族利益的僚屬還多着哩，只要我們留點心去看。爲了統一戰線，我們不能提出打倒他們的口號，然而爲了抗戰的前途，我們又不能不排除這中層的障礙。這才是苦悶，這也才是艱苦。我們應該怎樣呢？我們還只能本「和平奮鬥」的精神，用極大的誠意，極大的容忍，一步一步的去做。

最後說到民衆組織。在北伐時期，我們可以提出工農本身利益的要求來號召組織，現在不能了。現在我們只好舌敝唇焦的來啓發他們的民族意識，然後再組織他們。這又是一份很艱苦的工作。

工作更艱苦了，前途畢竟還是光明的。一切惡腐的勢力，在這個大潮流當中必然



會被沖洗得乾乾淨淨。看華北少數封建軍閥的下場是怎樣呢？我相信，事實的教訓一定會使許多本來做軍閥的自動的覺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宋哲元和劉汝明雖然坐誤戎機，然而畢竟不會做漢奸，石友三和孫殿英最近的努力，更使我們安慰。只要他們從今天起做一個革命的軍人，我們不但不算舊帳，而且應該格外的尊敬他們。我們希望其他的惡腐勢力都能在大潮流的洗禮之下大澈大悟，使國力不至再有一絲一毫的虛糜。只剩下來極少數怙惡不悛的分子，那才需要執法以繩——李服膺是一個先例。同時，我們也應該相信，用艱苦的努力組織起來的羣衆，必然可以發揮更切實的力量；這一種民衆的力量培養好了，必然可以使社會上惡腐勢力根本肅清。

讓我們從今天起加倍努力，負擔起來這個艱苦的任务吧！要知道民衆力量一天不發達，國力便一天多虛糜。工作即使艱苦一些，總比在敵人鐵蹄之下做工作來得便當吧！

這是在職業界救亡協會幹部雙十節歡宴席上的一篇演辭，事後追記，稍加整理，交救亡週報發表，作者附記。

## 平凡的領導和平凡的組織

在許多人的腦子裏，「領導」是怎樣神秘玄妙的一件事！他們一聽到「領導」兩個字，便要聯想到一位手裏擎着指揮刀在大隊人馬前面發號施令的司令官，或者要聯想到一位在講台上向滿堂的聽衆致訓辭的新式紳士。他們以爲一定要那樣，才算是領導。自然，這是一種領導的方式，然而，讓我們不要去意識牠吧！爲了這種形式的領導權的爭奪，我們在過去十年間曾經鬧了多少的糾紛！目下大家對於「領導」兩個字，除了覺到「神秘玄妙」外，還有些「談虎色變」之慨，也正是爲此。事實上，這種領導的方式和大多數人是不相干的。大多數人既不在「大隊人馬」之內，也不在「滿堂聽衆」之中，那裏有福氣接受這種「偉大」的領導呢？讓我們來談談平凡的領導吧！

紳士之所以爲紳士，無疑的是因爲他們在落後的農民當中，起了領導的作用。他們

那領導的方式是怎樣的呢？固然有許多是「託官威勢」，然而也有不少憑着他們高一些的智慧，替農民解決許多困難問題，因而取得農民的信仰。他們從來不「開會」，從來不知道什麼「領導」，而只知道向什麼先生「請教」，和什麼人「談天」。就在「請教」和「談天」當中，建立起來領導的關係。這是平凡的領導，然而倒是很真實的領導。

除了「領導」之外，「組織」也是一般人認為是很神祕玄妙的。許多人認為組織必須訂立章程，填入會願書，開成立大會，以至選舉執行委員，那才算是組織。還有人一提到組織，便聯想到秘密黨的組織；那不只是神祕玄妙，而且還帶有危險性。其實呢，前一種組織，也只有少數智識分子才配參加的，而後一種組織，是只有更少數的特別勇敢的分分子才能參加的。廣大的落後群眾只知道有事情的時候邀人一同做，有急難的時候大家一齊來搶救。比方，家裏有婚喪喜事，要許多人幫忙，農忙時要別人幫工，遇旱災大家起來去開水頭，遇火災鳴鑼聚眾去撲滅。那就是大眾所了解的組織，平凡的組織。

一號召，就領導起來幾萬人，一開會，就組織起來幾千人，那都是很需要的方式，然決

不是唯一的方式，而且也不是深入民間的方式。老實說，這樣領導起來的羣衆，還不足以言組織，而這樣組織起來的羣衆，也不足以言行動。它的範圍，自然也只浮泛在上層社會裏面，和廣大落後羣衆簡直是不相干。我們必須明白：領導起來的羣衆，倘使不進一步加以組織，那不過是「烏合之衆」；他們可以一呼而集，也可以一闕而散的。我們更必須明白：只講求形式的組織，所能得到的固然只有上層分子，而加入的分子，往往也不過做一個掛名會員罷了。用這種方式來組織廣大落後民衆，事實上是不可能；用這種組織來應付當前危局，力量上也決不夠。

平凡的領導是無可爭的領導，而同時是唯一能夠深入大衆的領導；平凡的組織是不易阻礙的組織，而同時是最可靠的組織。自然，這種工作是很瑣碎、很費力的，但是，我們決不能怕瑣碎，怕費力。統一戰綫工作之所以艱苦，就在這裏。我們既然不能像北伐時代一樣，可以提出工農本身的經濟要求做組織羣衆的工具，那末，除了準備格外艱苦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呢？倘使我們不準備格外艱苦的去，那末，即使爭取到一個完全的民衆

組織自由，會有什麼用呢？

讓我們把眼光放低一些，把工作標準定得更艱苦一些，負擔起來平凡的領導和平凡的組織任務吧！

× × × × × × ×

一位朋友看完了上面的文字，提出了兩個疑問：（一）紳士的領導值不值得仿效；既然紳士能够領導農民，又何必我們加入湊熱鬧？（二）婚喪喜事邀人幫忙的組織，不是足為組織的模楷？我仔細再讀了一遍，覺得這兩個問題的答覆是必需的。因為，要把人們的注意由一個方面轉到另一個方面，說的人不免要極端一些，聽的人就不免要格格不入。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已經說明：紳士的領導，有許多是「託官威勢」的，然而也有不少憑着他們高一些的智識，替農民解決許多困難問題。前一種就是所謂「劣紳」，而後一種就是所謂「公正紳士」的確，前一種與其說是領導，無寧說是壓迫；然而，很不幸的，

壓迫和領導久已被人混淆了，讓我們今後把他們分清吧！我認爲值得仿效的領導方式自然是後一種。儘管「公正紳士」的領導，也往往走上不好的傾向，但是，採取他們的方式是一件事，而走不走他們的傾向是另外一件事。新時代的胚胎，往往就在舊時代的方式裏孕育出來的，運用舊的方式並不一定要兜舊的圈子的。我們是去開掘礦藏，並不是去湊熱鬧。

對於第二個問題，上面已經答覆了一半了。我並不要維持婚喪喜事邀人幫忙的原始組織方式，然而我認爲只有從這個原始的方式裏，才能孕育出來新的方式。到落後的羣衆裏去馬上談組織，就只有嚇跑了他們。還只有先邀同他們幫忙做一些抗敵後援的工作，然後可以進一步的組織他們。

我的要旨是：到落後羣衆裏去，要先把工作方式裝得落後一些，要多多的利用他們聽慣、看慣的方式；然而，當然我們要在適宜的時候，不斷把方式提高的。利用落後的方式，不過是我們的一塊敲門磚罷了。

## 抗戰時期的民主問題

近來有些人一聽到民主兩個字，便立刻要想到下面的兩個問題：

- 一、抗戰時期正需要一個有力量的政府，爲甚麼還談民主呢？
- 二、抗戰時期正需要擁護領袖，爲甚麼還談民主呢？

對於這兩個問題，我們可以給他們一個很簡單的答復：民主就是民權，這一點孫中山先生已經對我們說過了；我們目下的抗戰，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不過是國民革命的一個新階段，是三民主義進一步的實行。那末，誰又能說抗戰時期就不需要民主呢？但，我們不願意提出這樣簡單的理由，我們要進一步研究這兩個問題的內含。

孫先生在民權主義，曾經把政權和治權分析得很清楚。他說：

「想造成新的國家，是要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

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

他又說：

「政府的威力可以發展，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有了這種政權和治權，才可以達到美國學者的目的，造成萬能政府，為人民謀幸福。」

這兩段話證明：民權的發展，不但不會降低政府的威力，反而可以增加政府的威力。歷史所給與我們的教訓，也只有民主制度能够澈底掃除政治上、經濟上一切封建割據的勢力，完成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建立起來一個有力量的政府。歐美各國近數十年間，民主制度所造成政治上的糾紛和政府基礎的脆弱，並不是民主政治的先天弱點，而是民主政治的後天病態。這是因為議會漸漸的變成少數資本家的工具，不能反映大多數人民的公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才會反映到議會裏去，而大多數人民一致的意見，反



而表現不出來。我們且看看，各國在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制度之後，專制的淫威是消滅了，政府的力量却只有增加。一個操生殺予奪大權的帝王，表面上看起來是「不可一世」，然而那裏能動員全國的力量？到是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雖然平時有議會的牽制，但是國力的增長和國力的動員，却絕對不是封建政權所能企及。我們再看看，近年來有些國家的人民大眾漸漸的覺悟了，漸漸的能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議士了，政治的基礎便比較的穩定起來。要之，民主政治暴露弱點的時候，便是議會不能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時候，便是民主變成虛僞民主的時候。民主本身會有什麼罪惡呢？

說到我國的民主問題，抗戰以前的民主呼聲和抗戰以後是不同的。抗戰以前我們談民主，是要政府執行人民公意，抵抗侵略；抗戰以後我們談民主，是要政府集中國力，動員民力，抗戰到底，以取得最後的戰利。老實說，目下民衆所願慮的，不是中央權力的過大，或者領袖權力的集中，而是怕中央的權力不能及於地方，領袖的意旨不能達於下層，以致削弱了抗戰的力量。我曾經說過：目下「上下一心」是做到了，中層却還有部分的問

題。人民要抗戰，領袖已經發動抗戰；人民要抗戰到底，領袖也要抗戰到底；人民要動員自己參加抗戰，領袖也說非動員全國人民參加抗戰，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領袖已經完全執行人民的公意，從領袖和人民的關係來說，那可說是再民主不過了。但是，中層却存在着少數的障礙物！

從軍事來講，華北戰事初期的失利，誰都是知道少數地方軍人還存着封建割據的意識，上不能執行中央的意旨，下違反了士兵抗戰的要求，以致坐誤戎機，迭失名城。倘使沒有這中層的障礙，中央意旨和士兵要求能打成一片，又何至於此？我們也知道：在這偉大的抗戰潮流中，一切腐敗齷齪的事物都要被沖洗得乾乾淨淨，一切障礙物都要被淘汰以盡。但是，用玉石俱焚、喪師失地的方式來沖洗淘汰，對於國力的消耗實在太了！

其次，在政治方面，貪污、顛頂的官僚風氣，龔斷、把持的閱閱意識，和播弄是非的政客技倆，依然到處遺留着；甚至認賊作父的敵探、漢奸，也不斷的發現出來。無疑的，過去十年間對內、對外的妥洽政策，曾經使許多惡腐習氣重新抬頭，同時，許多惡腐分子，也乘機混

到政治機構裏來。他們有的欺上蒙下，有的諂上虐下；一面陽奉陰違，阻礙中央政策的執行，一面狐假虎威，削弱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仰。萬一軍事上受了頓挫，重新提出妥洽主張，企圖動搖抗戰的，恐怕也就是這一班人。

復其次，在社會方面，新舊土劣把持後方工作及保甲制度，以爲個人乘機漁利的工具，也所在都有。如制裁漢奸及抽調壯丁，便在許多地方成爲土劣敲詐平民的口實。他們爲了要掩蓋自己的劣跡，便不能不壓迫民衆的拾頭。國家在抗戰時期中如何迫切需要民衆的奮起，那裏是這一班人所能了解，所肯計及？這一班自私自利不知羞恥的棍徒，在敵兵壓境的時候要重新爲了自己的私利變成漢奸傀儡，自然都是意中事。

這種種中層的障礙物，上面篡竊了政府的治權，下面掠奪了人民的政權。我們現在要求民主，便是要求他們把治權還給政府，把政權還給人民。就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來講，我們希望政府能够肅清一切欺上蒙下、諂上虐下的惡腐分子，造成一個上下一心的局面；就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來講，我們希望中央能够肅清一切封建割據的殘餘意識，以造成

一個真正的統一國家。爲要達到這種希望，我們認爲政府必須先給人民以更多的民主權利，一面使人民可以自動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同時貢獻自己的力量；一面使輿論能成爲民衆的喉舌，足以露暴一切巧取豪奪、欺壓平民的劣跡，糾正一切把持壟斷、腐敗顛頂的風氣。這種任務的澈底執行，專靠上面一個雷霆萬鈞之力，是不夠的；即使布置一個偵查網，恐怕也收效甚微；一定下面有民衆的力量做基礎，上面力的量才能發揮出來。惡腐分子所怕的，並不是掛一漏萬的上面的制裁，而是萬目睽睽的民衆的制裁。

偉大的抗戰是整個民族的試金石，也是每一個人的試金石。誰愛國，誰不愛國，誰進步，誰腐敗，就從他們對於抗戰的熱情當中充分表現出來。我們在這個大潮流當中，用不着有什麼黨派意識，也用不着有什麼階級成見；因爲，民族的利害終超過任何團體的利害，而亡國奴的痛苦畢竟是超經濟的。更具體點說：我們用不着過分重視一個人的過去歷史和經濟基礎，而只須注意他在今天的表現；一個軍閥參加了抗戰，一個土劣發動了後援，我們就應該立刻引爲同志。陣綫太容易劃分了，一切籠統的「反對」「打倒」口

號，現在都不需要了。只要大家都能化除成見，聯合一切愛國的人，同時破除情面，制裁一切自私的人，中層的障礙就可以很容易的掃除乾淨。

歷史上民主制度的實行，往往就在大潮流當中。我們現在上面有執行人民公意的領袖，中層有很多純良的幹部，下層還有意志統一的民衆；民主權利的開放和政府治權的提高，已經變成不相抵觸不能分離的兩件事，還有什麼值得顧慮呢？難道「民主集權」四個字的涵義都會忘記了嗎？

總之，爲要保證抗戰的最後勝利，我們需要一個萬能的政府；但是，一個萬能的政府，必須有偉大的民衆力量做基礎。抗戰時期的民主，目的就在提高民衆的力量，排除中層的障礙，使民衆和領袖打成一片，使中央和地方合成一體，以造成一個萬能的政府。

(二六·一〇·二三——申報)

## 現階段的救亡運動

提到現階段的救亡運動，也許就有人要問：救國會現在怎樣了呢？

關於救國會問題，我在看守所裏曾經以金鋒的筆名，在學生之路發表一篇救國會和救國運動的前途。我在那篇文章裏就指出：救國會已經到了揚棄自己的一個階段了。我們做救亡工作，目的在發動自己最大的力量，為國家謀最大的利益。在那時候，因為我們七人的被捕和各處救國會的受打擊，救國會的名義已經不適宜於組織羣衆，倘使再用救國會的名義去組織羣衆，徒然嚇跑了羣衆，同時惹起了對當局的磨擦；無補於羣衆組織的發展，而有害於全國團結的加強。所以，我那時就主張我們應該停止以救國會名義去組織羣衆。

但是，救國會的羣衆組織是一個問題，而救國會的幹部體系和政治影響是另一個

問題。幹部的提拔和訓練，是很不容易的。誰都不能否認：我們自從「一二九」開始，已經完成了一個比較健全的幹部體系。這個幹部體系，倘使讓它就此渙散，那是國家的一個損失。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個幹部體系，有步驟的動員到廣大的救亡陣綫裏去，使他們負起更大更高的整個救亡運動的幹部任務。我在那篇文字裏就要求全國的幹部以後要站到更大更高的救亡運動的立場裏去，而不要再泥拘在救國會的立場。只要整個的救亡運動能夠開展，就是國家的利益，也就是我們的光榮。只要國家得救，犧牲了一塊救國會的招牌，能算得什麼呢？

說到救國會的政治影響，誰都承認是相當廣大、相當深入的。所以我同時主張我們應該繼續運用我們的政治影響，以促進民族統一陣綫的完成。

從西安事變、三中全會一直到蘆溝橋事件，外間同志的工作路線，大概都和我的主張不謀而合。各地幹部有許多都已經用歌詠、戲劇以及種種可以取得當地當局同意的組織方式，把自己的力量供獻到更廣大的工作園地裏去，而開展起來更普遍、更深入的

工作基礎。同時，救國會在那一時期中所發表的文件，的確也能緊緊的把握時局，深深的顧全大局。我們那時還不斷的轉告外間同志，千萬不要因為營救我們，採取足以增加當局誤會的行動；因為我們幾個人的死活事小，而民族統一陣綫的成敗事大。這一點意見，他們也都深深的體會的。

我們恢復自由到了上海之後，許多幹部同志歡迎我們，徵求我們對工作的意見。我告訴他們：要由有團體做到無團體，目下不妨有幹部間的聯系，以加強工作力量，但千萬不要有門戶之見；我們要把我們的力量，有步驟的融化在整個的救亡運動裏去。

以後到了南京，有一位負中央黨務責任的人和我們說：「救國會有很光榮的開始，有很光榮的經過；但是，到了現在，救國會的主張已經變成了政府的行動，所以，救國會的任務已經完成。我希望救國會能做一個光榮的結束。」

我當時這樣回答他：「我們過去責備別人不顧大局，我們決不做不顧大局的人；我們主張民族統一陣綫，我們決不做民族統一陣綫的障礙物。倘使在這個危急關頭，我們



還存一絲一毫門戶之見，我們便變成沒出息的人。我希望國民黨在這時候能够把民衆救亡工作的大門打開，那不但我們的門戶要自動關閉，其他的門戶也要自動關閉。我希望國民黨用一隻大鉢頭來接受我們這一碗水，而不要用一隻小酒杯來接受我們這一碗水；爲了民族的利益，我們不忍見這一碗清潔的水，只有一部分倒到小酒杯裏去，而大部分潑在地下。」

我還很坦白的告訴他：「我從前是一個不滿意於國民黨的人，然而，近年來我却不斷希望國民黨能有一個偉大的成功：因爲，我覺得現在國民黨的成敗，和國家民族的利害關係太密切了。國民黨怎樣能取得這個偉大的成功呢？我以為只需「寬大」兩個字。目下已經沒有人要打倒國民黨，所以，國民黨可以很放心的開放民衆運動。國民黨應該用很寬大、很積極的方式去領導民衆運動，而不要用很徧狹、很消極的方式去包辦民衆組織。國民黨可以運用他的統治權，在工作上領導民衆運動，在立法上監督民衆組織，而不必參加到每一個民衆組織的幹部裏去，枝枝節節的去干涉他們。各地抗敵後援工作

應該統一，那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以人爲單位的民衆團體，應該讓大家有組織的自由。以人爲單位的民衆團體，有時候主張相同，但是因爲人事問題，竟也不能不分成幾個團體。我們自然希望他們能夠統一起來，但是不能一蹴而幾。我們還只有先讓他們一個一個的自由組織起來，先要有許多小團體，然後能夠希望聯合起來成爲一個大團體。我們要先使他們在工作上統一起來，再進一步統一組織。比方倘使今天要發動宣傳工作，我們便可以讓各個團體動員出來宣傳隊，大家在同一宣傳綱領下共同努力。在工作上大家能夠合作了，再進一步統一組織就不難了。」

關於救國會問題，我們當時同意先在上海實行融化工作。我們希望上海除了文化界、救亡協會以外，能夠再組織起來職業界、學生、工人以及婦女的羣衆性團體，使過去救國會的幹部和羣衆，都能有參加組織和負責工作的機會。我們告訴他：「救國會的幹部和羣衆是沒有什麼黨派成見的，他們所要求的，不過的團體生活和救亡工作。他們並不堅持在那一個招牌底下過團體生活，做救亡工作。」

「八一三」砲聲起來的時候，我們再回到上海。上海黨務負責人的態度，的確是很好；以人爲單位的民衆團體，已經取得相當的組織自由了。同時，我們聽說中央已經下了消除過去一切黨內黨外偏見的通告，可見「寬大」一點，中央的意旨是和我們的希望相合的。但是在內地各處，情形却不同；許多地方民衆組織依然不能自由，甚且有以漢奸名義誣陷愛國青年的。因此，有一次我有事到南京去，重新向一位中央黨務負責人提起「寬大」的問題。我說：「舉輕可以把持，舉重必須握柄；居低不能臨遠，據高始能見大。國民黨目下是舉重的時期了，是應該執行較高的領導了。過去你們好比是要舉起一個小鐵球，你們可以一把抓住它舉起來；現在你們好比是要舉起一個大石礮，一把抓住是永遠舉不起來的，是必須把握住他的柄才能舉得起來的。過去你們好比是主持一個十公畝的運動場，你們只須有一個三公尺高的司令台；現在你們好比主持一個一百公畝的運動場，你們必須有一個十公尺高的司令台。所以，我希望你們進一步開放民衆運動，而同時用提綱挈領的手段執行真正的領導。你們上面可以運用統治權監督民衆運動，下

面可以動員黨員參加民衆組織。不過，參加的黨員，應該以民衆的面目出現，而不要運用黨權來支配團體負責人的選舉。過去爭取主席和多數常委的方式，執行領導則不夠，執行監視則不必，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們繼續談到內地的民衆運動問題，他說有幾處的救國會仍在單獨活動，因此起了誤會。我說我們可以勸告他們加入當地抗敵後援會共同工作，但希望當地抗敵後援會不要歧視他們。

我在南京還遇到幾位平津南下的同學，我知道他們組織了一個平津流亡同學會。我就告訴他們：「這個團體最好是作爲一個招待或者通信機關，不要作爲一個經常的羣衆性的團體。平津同學歷史上的精神，是值得傳播全國的；但是，許多平津同學經常集合在這個團體裏面，豎立起來一個壁壘，對當局足以引起誤會，而同時消失了自己。在學生羣衆裏的作用，是很不聰明的。你們能够繼續求學的，還是分散到各學校裏去，不能求學的可以分散到各種實際工作裏去，留這個團體做你們的通信機關，作精神上的聯絡，

豈不好嗎？」

上面的許多話，凡是我所說的，就是我所想的。我生平只知道以坦白至誠對朋友，對一切人；我不會說假話，也不會買弄官僚政客的手腕。倘使我說話過於率直，一時會引起別人的反感的話，我相信將來終有一天會明白我所說的句句是老實話。

由上面的許多話說到本題，我可以很簡單的把現階段的救亡運動下一個定義：

現階段救亡運動的目的，是在發動更大的羣衆參加抗戰，用一切的力量鞏固民族統一陣線，以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

爲要發動更廣大的羣衆，我們一面要爭取更多的民衆組織的自由，一面便要準備做頂艱苦的組織工作。有些人怪我過分責備青年不肯做艱苦工作，但是，他們却不曾注意到我同時在談話和文字當中，也在不斷的要求組織的自由。倘使不肯艱苦，爭到了自由會有什麼用呢？墨西哥的大總統喀地那一心一意想提高工農的利益，但是因爲工農組織力量不夠，墨西哥的軍警依然要在資本家和地主的指揮之下壓迫工農。自由決計

不是上面的一紙命令所能給予的，是要民衆自己的力量去兌現的。我們還能够把「艱苦」兩個字須臾忽略嗎？目下許多青年不肯做艱苦的工作，是一個事實。比方，在上海我們已經有相當的自由了，然而我們並未能充分運用這個自由。有些青年我教他們去組織里弄，他們就嫌里弄不容易組織。倘使上海的里弄都不容易組織，還談得到組織農民嗎？有人告訴我：許多人生活成了問題，所以無法開展工作。自然，我們不能希望一個人餓着肚皮做工作，但有飯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動員了呢？倘使生活不安定或者生活苦一些就不能做工作，那我們得想一想前方的兵士是在過怎樣的生活。上海的居民還有三百萬人，而我們的組織力量還只有這一些，我想到一面是危懼，一面是羞恥！

還有人因為我不主張提出工農的本身經濟口號做組織羣衆的工具，就誤會我忽視了人民的生活。我且問：在事實上，我們現在能够用要求增加工資的口號去組織工人嗎？能够用要求減租的口號去組織農民嗎？我每次說到戰時經濟，都主張人民要有水平線上的生活，要使每一個壯丁像壯丁了。但是，這種要求，我們目下只能向政府提出。事實上，

政府又何嘗不在計劃這種政策的實行？至於少數工廠主人乘機減低工人工資，要想在戰爭中發他們的財，我們也正應該向輿論申訴，向政府要求，給他們以制裁；工人組織如提出這種要求，是天公地道的。但是，這並不妨礙「不以本身經濟口號做組織工具」的一般原則。

要鞏固民族統一陣線，必須對於民族統一陣線的前途有不可動搖的信念。我們得時時刻刻想到：這個民族統一陣線，是多少土地、多少頭顱換得來的，我們還不應珍惜它、愛護它、而用一切的力量鞏固它嗎？我還曾經說過：倘使這次的民族統一陣線還要出了破綻，那我們這班人就只可自殺以謝天下。我已經堅決的認定，民族統一陣線的支持是我的歷史任務，我要用我的性命去保護他。我信任它前途的光明，我也理解它過程的艱苦；我不否定他有可能的危機，但是我認爲只有用我們的至誠和努力才能克服這種可能的危機。只有動員廣大羣衆參加抗戰才能克服這種可能的危機。過分強調危機是徒然取消了自己的目的，而空喊危機却成爲毫無意識。

要鞏固民族統一陣線，除了對於民族統一陣線要有不可動搖的信念之外，我們還要加強我們超黨派、超階級的立場。我們並不否認，在我們這一羣人當中，每一個人都歸屬於一個階級，而且還有些人參加各種黨派。但是，我必須很鄭重的指出：在這不團結便要做亡國奴的威嚇之下，最能克服階級意識的人，便是最能保護階級利益的人；最能克服黨派意識的人，便是最能保護黨派利益的人。倘使國家滅亡了，任何階級、任何黨派都只有死路一條！我們也可以說：抗日是現階段階級鬥爭和黨派鬥爭唯一的最高的任務。

爲了要鞏固統一陣線，我們還要有極大的誠意和最大的寬容。我並不是跟着觀念論者去談誠意，而是因爲最高的哲學就是真實的哲學。真實的哲學是不容許有一絲一毫的虛偽的；在偉大的潮流中，一切的虛偽也都會被沖洗得乾乾淨淨的。我也並不是用機械論者籠統的態度去談寬容，而是說當前激變中的現實需要我們更辯證法的去分析每一個階級的動態；精密的分析可以使我們得着更多的夥伴，而使敵人進一步的孤立。同時，在洶湧的偉大潮流中，不做漢奸就做同志，不表示愛國熱情就是叛國，誰都不能



再有模稜兩可的態度。因此，我們便不必再過分重視一個人的過去歷史和經濟基礎，而只須看他目下對於抗戰的熱情。這就是我們所應有的寬容。

只要我們能夠這樣做，我們必然可以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民族解放戰爭最後勝利的保障，依然要靠我們的正確態度和最大努力，否則不管客觀條件如何成熟，我們依然可以暫時遭遇可恥的失敗。

我以後願在本欄和全國救亡工作者常常見面，特別對於過去救國會的會員，在這個揚棄融化的過程中，我總覺得還負有替他們解決問題和解除苦悶的任務。我希望大家能把實際工作的經驗貢獻出來，同時把一切困難問題提供出來，共同來耕耘這一塊新開的園地。我們不要有任何的組織壁壘，然而不妨有精神的交通；我們還要運用這個精神的交通，消除一切內部的壁壘。

(二六·一〇·二九——國民)

## 以抗戰到底的決心去運用九國公約會議

從民族解放的意義來說，九國公約並不是一紙光榮的國際契約；但是，在今天，我們却可以把牠運用起來做一個有利的外交工具。九國公約的主要目的，是「門戶開放，利益均沾」八個字；爲要達到這個目的，牠不能不有保持中國領土、主權和行政權完整的規定。更明白點說：牠的目的是要使中國長久的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成爲國際共享的一塊肥肉；但是，在目下日本帝國主義想獨占中國作爲牠的「禁嚮」的時候，保持中國領土、主權和行政權完整的規定，却可以成爲我們有利的外交工具。這也並不是說，我們目下要重新去爭取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是說，我們在衝破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獨占企圖之後，我們一定可以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等到我們成爲一個獨立國家的時候，我們再以主動的地位去運用「門戶開放，利益均沾」八個字，歡迎各國的投資，那個意義又和

目下不同了。弱國決計不是無外交，然而，弱國的外交，就只有「運用矛盾」四個字。從不利的條件當中看出有利的一點，充分運用這有利的一點使不利的條件變成有利的條件，這是「運用矛盾」的極則。

國聯爲甚麼要決議召集九國公約會議呢？這是因爲國聯在目下，已經不是處理遠東問題的一個有力機構了。美國不會參加國聯是主要的缺陷，而日德退出國聯是次要的缺陷。爲要彌補這種缺陷，才不能不召集九國公約會議。所以，這個會議最有利的一點，就是美國的積極參加對付遠東問題的國際集體行動。日本雖然拒絕參加，然而這個拒絕就是對我們有利的；這又進一步的證明牠是不顧條約尊嚴的一個國家。德國爲甚麼不參加呢？這是三個法西斯國家的預定計劃，詳細情形且待下文說明。

美國對付遠東問題，一向是比較積極的；原因是因爲美國在遠東方面，現存的投資利益和殖民地關係比較的小，而未來的期望却很大；牠在美洲的地位，也比較的鞏固；所以牠不像英國紳士有那麼許多的顧慮。這，我們從一九三一年史汀生的活動，就可以

看出來了。史汀生的活動，因為英國不合作，終於失敗。這是英國保守黨政府遭受國際和國內民衆譴責的一件事情。幾年來，英國賄賂侵略國的行動，不但使遠東問題更加不可收拾，地中海問題也弄得焦頭爛額。英國紳士現在追想起來，恐怕也不能不後悔吧？或者正是因為有些後悔，所以在處理意阿戰爭的時候，已經比較的積極，而目下處理西班牙問題，是進一步的積極。這種積極自然還不够，但是，比較一九三一年對付遠東問題的態度，畢竟是不同的。

正和英國在地中海方面不能放棄親善德意抑制法蘇的政策，而改爲拉攏法蘇對付德意一樣，牠目前在遠東方面，也不能不放棄賄賂日本排擠美蘇的政策，而改爲拉攏美蘇對付日本了。自然，我們並不是說英國就會放棄牠的基本的妥洽態度；然而日本不是牠的忠實的看家狗這一點，英國總會覺悟到吧？那末，我們說牠目下對於遠東問題，情願扶掖美國做一個領導者，當然也不是過高的估量。

蘇聯對付遠東的態度又是怎樣呢？我們不能否認牠是很關心、很同情中國的，但牠

也是特別慎重的。自然中國的事情主要的是靠我們自己，友邦援助是有限度的。誰肯因為援助中國而不必要的牽入戰爭的漩渦呢？不管是美國或是英國，都還不願意蘇聯在遠東取得領導的地位，德意更不惜以戰爭的威脅，使牠不敢在任何國際問題上過分猛進。倘使蘇聯的態度過分猛進，目下的地中海糾紛和遠東糾紛，是可能在朝夕之間轉變為國際反共戰爭的。比方，倘使蘇聯公然加入中日戰爭，德國在國際防共協定的拘束之下，是不能不公然幫助日本作戰的。英美在那時的態度，也就很難說了。那樣，對於蘇聯固然不利，對於中國是不是有利，也成了極大的問題。因此，牠目下對於遠東問題，恐怕還只能通過國聯和九國公約會議的機構援助中國，牠情願在美國的領導之下解決遠東問題，而不願意出鋒頭。只要美國對付遠東問題態度比較積極一點估計得不錯，英國和蘇聯要跟着積極起來，也許是不成問題的。

但是，我們能不能對九國公約會議存很大的期望呢？我們不能。九國公約所訂定的辦法，不過互相諮詢而已。我們只能希望牠能判定日本已經破壞過公約，希望參加會議

的國家，除了日本的與國意葡兩國之外，能進一步作超出公約的共同行動，而不能希望公約本身發揮實際的力量。這種共同行動，我們目下也還只能希望他們一面消極的給日本以外交上的威脅，如召回各國駐日大使之類，而一面積極的給中國以物質和技術的援助。此外如經濟制裁、軍事制裁，以至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我們目下應該要求將來希望可以做到，然而不能希望很快的就可以做到。

在「安不忘危」的意義之下，我們不但不能有奢望，而且要有相當的警戒。首先在軍事方面，散人乘機用死力在東西兩戰場同時猛攻，已經見諸事實了。其次在政治方面，少數親日分子想在這時候進行和平妥洽運動，也是必然的。此外在國際方面，德國也在醞釀一種和平妥洽運動，而且這個運動是和國內親日分子的和平妥洽運動相呼應的。據說德國在華的一位商業領袖，已經向德國外交當局提出這樣的意見：

「中日兩國在上海附近的戰爭，是一個標本的現代戰爭。中國軍隊能應付這個戰爭，而且能在第一道防綫支持到兩個多月之久，是出於意料之外的。中國有大量人力的

儲蓄和資源的蘊藏，所缺少的不過是軍火；但是，日本却不可能斷絕列強對中國軍火的接濟。所以，中國能維持這個戰爭，也是沒有問題的。倘使這個戰爭能維持六個月，日本的軍力便要消耗過半。那便宜的是英美法蘇各國，而頂吃虧的是德國。首先，蘇聯可以徵調遠東陸空軍的半數，到歐洲去對付德意；其次，英法兩國也不必再畏懼日本在遠東的武力，而可以在歐洲方面採取更強硬的態度；復其次，美國在太平洋方面，也消除了一個威脅了。那樣，德國將來在歐洲方面的發展，必陷於重大的困難，而在戰爭繼續當中，還要使艱苦造成的德國在中國貿易的優勢，陷於破滅。爲要把這個不利於我們的形勢轉變爲有利於我們的形勢，我們必須趕快領導一個遠東和平運動；我們要加緊對中國穩健派（？）的合作，完成這個和平運動。那我們將來便可以代替英國，把握全中國政治的樞紐，而在中國發展更大的經濟利益。

所謂穩健派是什麼人呢？那無疑的是親日份子了。從這個意見當中，我們還可以知道，日德意三個法西斯國家，在這時候是有預定的分工的。那就是日本加緊牠的武裝侵

略，意大利參加九國公約會議做日本的代言人，而德國發動另一個和平運動，以與九國公約會議對抗。

我們應該怎樣運用九國公約會議呢？

我們應該以抗戰到底的決心去應付牠。有人說，我們的國際同情是溫和的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我們反對這種見解，我們要認定我們的國際同情是抗戰力量換來的。倘使溫和的外交政策可以換取國際同情，那末，過去的外交政策只有比現在更溫和，爲甚麼要到今早才有國際同情呢？所謂抗戰力量，也不必是在某一條戰綫上硬拚，而主要的還是抗戰到底的決心。只要我們在由某一條戰綫退却了之後依然繼續抗戰，我們反而可以表現出來更大的抗戰到底的決心。

我們並不反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應該溫和些，然而，溫和是有限度的。超過了這個限度，那就變成國際的懦夫；國際的懦夫是不會有人同情的。我們與其說溫和，還不如說合理而堅決。那就是說：我們需要和平，然而同時需要保持國際條約的尊嚴和人類的公理。



正義也只有這樣，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爲了保持國際條約尊嚴和人類的公理正義，我們必須有抗戰到底的決心。

在九國公約會議開會前，蔣委員長已經重復對外報記者表示抗戰到底的決心，外交部對日本拒絕出席的遁辭，也有嚴正的駁斥，我國出席代表更表示雖不峻拒調解，但不能接受任何違反條約精神的調解方案。這和全國人民的要求，可說是完全一致的。我們要明白：不違反條約精神的調解，就是不可能的調解，日本帝國主義是會首先拒絕的。總之，自從盧溝橋事變以後，數十萬將士已經流了他們的赤血，數千萬人民已經遭過家破人亡的災禍。這種犧牲爲的是什麼？爲的是前途的光明。到現在，誰說妥洽，誰就辜負了被難的將士和人民，誰就是全國的公敵。所以，中途妥洽是不可能的。我們在這時候，一面應該多信任一些抗戰到底的整個國策，勿輕爲流言所動，一面自然也應該儘量注意那些想利用九國公約會議以進行無恥妥洽的少數人，免得他們藉此動搖人心，淆亂是非，間接的幫助了敵人。